

自由鬥士

索忍尼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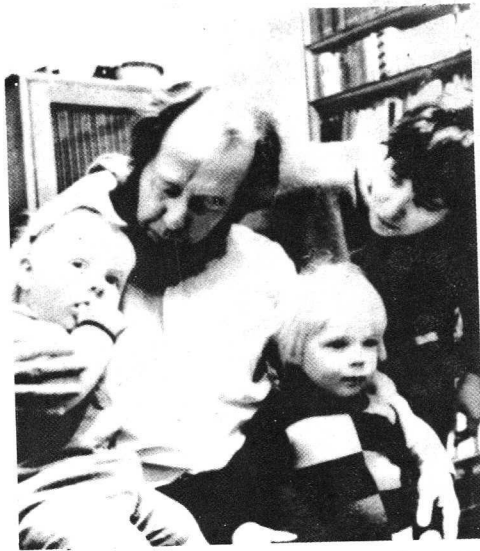


◦ 婦夫辛尼忍索 ◦ 辛尼忍索的頭低權極向不

◦ 州蒙特佛國美土國的由自在



自由鬥士——索忍尼辛



。地天的由自在活生人家的他和辛尼忍索



員議參國美與前廈大會國府華在(中)辛尼忍索
。敬歡(右)斯姆赫, (左)森克賈

前言

蘇俄文學家索忍尼辛生於一九一八年，出身哥薩克的知識份子家庭。以短篇小說「伊凡的一天」奠定其在世界文壇的地位。由於他的作品均以其親身被囚禁過的勞工營生活情形為題材，有力的揭露了蘇俄奴役人民的殘酷事實，因而成為俄共迫害對象，許多作品被禁出版，一九六九年更被蘇俄作家協會開除會籍。一九七〇年以「癌症病房」一書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因懼怕出國領獎後，無法再返蘇俄，因此不得不放棄到瑞典領獎。縱然如此，依舊不容於俄共，終在一九七四年二月被驅逐出境。

這位飽受共產極權政治迫害與折磨的自由鬥士，於本(六十七)年六月八日在美國哈佛大學學生畢業典禮中發表演說，以「一個分裂的世界」為題，痛陳西方社會在高度物質生活水準下，斲喪了精神與意志的力量，而呈現出軟化、腐化與惡化的傾向。並嚴肅的提出警告說，如果我們不改變目前的墮落趨勢，即使我們能逃過戰爭毀滅，也逃不過自我毀滅。對於價值觀念日益偏頗、道德勇氣日漸淪喪的西方社會，此篇演說不啻暮鼓晨鐘，當頭棒喝，委實值得自由世界深思、警惕！

自從索忍尼辛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說後，在美國已引起熱烈的反響與不同的議論，同



3681441

658574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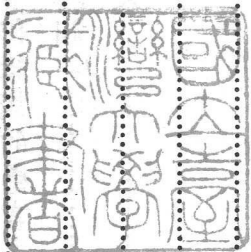


自由鬥士「索忍尼辛」

目錄

前言

一、自由鬥士「索忍尼辛」	一
二、被放逐的蘇俄作家「索忍尼辛」	三
三、「索忍尼辛訪問錄」	五
四、關中教授評介「索忍尼辛訪問錄」	二〇
五、時代的獅吼，歷史的證言	二五
六、再論「索忍尼辛的證言」	二八
七、「索忍尼辛訪問錄」觀後	三一
八、勇者的證言——索氏哈佛演講追記	三四



3681441

時為我國各方所注意。本會有鑒於此，特蒐集此篇演說英文全文暨有關資料，彙編成冊，以供各界參考。

中國國民黨中央青年工作會謹識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七月

九、關中教授評析「索氏哈佛講詞」	五六
十、美國各界對索氏哈佛講詞的不同見解	六〇
十一、中華民國學者和宗教界對索氏哈佛講詞的感言	七三
十二、一個中國人讀「索忍尼辛哈佛講詞」	八〇
十三、附錄「索忍尼辛哈佛講詞」原文	1

自由鬥士「索忍尼辛」

自由鬥士：索忍尼辛



對自由世界文壇人士的熱烈聲援無動於衷，對輿論界的強烈譴責充耳不聞，蘇俄政府當局終於悍然地將該國文學家索忍尼辛驅逐出國，使他先在西德棲身開始過着流亡生涯，然後在美國定居。

蘇俄當局之所以把索忍尼辛驅逐出境，實率因於他的著作：「古拉格羣島」在巴黎秘密出版。「古拉格羣島」是一部對史達林囚犯集中營控訴的反共著作，因而觸怒了蘇俄當局，嚴厲批評索忍尼辛是「叛國者」。

在該書出版之前，蘇俄的秘密警察曾用盡一切卑鄙的迫害的手段，展開地毯式的搜索，要追回原稿，結果造成一名婦女因被疲勞審訊過度，受不了精神迫害而懸樑自盡的悲劇。

索忍尼辛過去曾在監獄和集中營渡過漫長歲月，並和二百二十七名勞工營裏出來的人作過晤談，最後才寫成「古拉格羣島」這部控訴俄共政權罪行的血淚著作。

在索忍尼辛的著作中，前幾部的小說如：「伊凡的一天」、「癌症病房」、及「地獄第一圈」均只

論及史達林的恐怖，而「古拉格羣島」則對官方已奉若神明的列寧大肆抨擊。書中並透露史達林要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計劃。他決意要將這部著作作為蘇俄年輕一代的主要遺產，而將掛滿勳章和高談戰役輝煌的上一代視為糞土。因此西方評論家說：「古拉格羣島這本書是一枚炸彈，目的在毀掉黨的神話與權力的支柱。」

這位個性倔強的作家，在十六年前因出版「伊凡的一天」短篇小說，而在世界文壇奠定地位。該篇小說是描寫在史達林時期一個強迫的勞工營一天的殘酷生活。

由於他的作品均是以勞工營為題材，暴露蘇俄奴役人民的殘酷，因而成為蘇俄當局不受歡迎的人物，若干部作品被禁出版。一九六九年，他被蘇俄作家協會開除會籍。一九七〇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因懼怕出國領獎後不准再返蘇俄，因此他沒有到瑞典領獎。

索忍尼辛第一次與瑞茜朵娃卡雅於第二次大戰前結婚，於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婚姻破裂。在一九七四年前三年中，他一直在莫斯科與一位三十多歲的美麗女科學家住在一起，生下二子，並於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在莫斯科的一間俄羅斯正教堂完成結婚儀式。

被放逐的蘇俄作家索忍尼辛

被俄共放逐的蘇俄作家索忍尼辛，曾一度被蘇俄新聞界譽為才華燦爛的偉大作家和「新托爾斯泰」，但現在他已被指為「叛徒」和「賣國賊」。

索忍尼辛少年時代，是名狂熱的共產黨員，卅年代魔王史達林血腥的大整肅，使他開始懷疑共產思想 and 共黨制度。

一九四五年，他擔任蘇俄紅軍的砲兵連長，即大無畏的批評長官。他寫了一封信痛陳史魔罪行，被立即摘掉官階，並列入勞工營八年。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內，索忍尼辛除於一九七〇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外，繼續不斷的作西班牙作家吉哥德式的奮鬥，來爭取蘇俄社會的創作自由。於是這位面帶憂容的作家，被西方視為蘇俄在世的最偉大的作家和持不同意見的蘇俄知識份子戰鬥的象徵。

這位五十九歲的蘇俄作家，十六年前出版他的短篇小說「伊凡，且尼索維契生命中的一天」後，聞名西方。

這篇小說於赫魯雪夫鞭屍史魔時出現，刊在蘇俄「新時代」雜誌上，儘管蘇俄統治者反對他，但終被赫某開脫。這本書出版後，使他在國內外，聲名大噪，但幾年內，風頭轉向，他漸被官方厭惡。

一九六七年，索忍尼辛寫信給蘇俄作家聯盟，痛責作品檢查，並描述近年來如何不能出書，雖然他自一九六四年後，即無法在蘇俄出書，但他的書，像「第一層地獄」、「癌症病房」、和「一九一四年八月」，均在西方暢銷。一九六九年他被蘇俄作家聯盟除名。

索忍尼辛生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出身哥薩克的知識份子家庭，故鄉羅斯托夫是頓河上的河港城市。一九四五年應徵入伍，戰時升至砲兵營長，作戰勇敢，曾因受傷獲授勳章，他自寫信獲罪坐牢後，即在省城黎亞揚充任教職，在第一部著作出版前，一直默默無聞。

索忍尼辛訪問錄

評析西方國家的缺失

強調弘揚道德標準

民主自由與共產極權的對抗基本上是思想、意識型態的衝突。所以我中華民國三十年來的反共鬥爭，始終秉持先總統 蔣公「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昭示，堅持維護「三民主義」思想的信念，決不動搖退讓。

索忍尼辛熱愛他的祖國，但堅決反對奴役蘇聯人民的共產極權制度。他自被放逐以來，目睹西方自由國家喪失政治道德，一味姑息、妥協，痛心疾首的發出警語，強調自由國家不可以沒有目標、沒有原則，並尋找藉口去縱容極權主義擴張。這正印證了我中華民國在全球反共鬥爭中，始終是正義與道德的中流砥柱。

英國BBC電視評論家麥克查爾頓於不久以前訪問索忍尼辛，經由中視轉播的這篇記錄，一方面給我們國內外從事反共愛國教育工作者精神上的共鳴，另一方面反映出我政

府一貫的嚴正立場，在全球的反共聖戰中，所作的貢獻。

六

訪問者：麥查爾頓（以下簡稱麥）。

被訪問者：亞歷山大·索忍尼辛（以下簡稱索）。

麥：索忍尼辛在這個充滿猜疑的時代，是一位代表人類良知的偉人。索忍尼辛先生，當蘇聯政治局和布里茲涅夫決定把你放逐國外，而不是關入集中營，他們必然認為你在國外，對蘇聯造成的損害要比在國內小。你認為時間是否證明這項判斷正確呢？

索：你提出這項問題，是基於一項錯誤的假定。一個人這樣提問題，必然假定政治局有全權獨斷去做決定，可以自由決定走那條路。我必須說，在我被放逐的時候，情形是很特殊的。一九七三年秋天，西方輿論對沙洛夫和我的支持，在我們和蘇聯正面衝突之際，是如此的強有力，如此的不讓步。這種支持，西方好久沒有表現如此的堅定不屈使得蘇維埃政治局害怕了。他們沒法完全自由選擇，到底是囚禁還是放逐我。他們對西方這種義憤的怒喝感到害怕，只好被迫放手，這是被迫的讓步。因此我想現在就算他們後悔——而我想他們也確實後悔——但我們應該記住，他們事實上別無選擇。在那難得的時刻，西方顯示了空前的堅定，迫使他們退讓。

所作警告
遭人忽視

麥：換句話說，如果你感到你的警告和意見，被西方人士當做耳邊風，你對一切事愛莫能助不正好他們的希望嗎？

索：是的，如果從這個角度看，你是對的。我的警告、別人的警告、來自蘇聯沙洛夫夫的嚴重警告，都被忽視，大部份被當做了耳邊風，人們不願聽這類話。我曾希望人生的經驗可以傳下去，國家傳國家，個人傳個人。但我現在開始對此懷疑了，可能每個人都註定要親身經歷後才能去真正瞭解。

麥：在觀察目前東西方的爭論，你處在一個特殊的地位。廣義說來，它也是針對著你的經驗著作所引起的：俄國人的經驗對西方到底有何重要呢？

索：事實上我們俄國的經驗——當我說「俄國」，通常我是把它與「蘇維埃」分開的，我想到的甚至是「蘇維埃」以前的經驗、革命前的經驗、事實上俄國的經驗——對西方是極為重要的。由於歷史的機緣，我們早已走過了西方目前所走的路，比西方早了七、八十年。現在我們以一種很奇特的感情去看發生在你們身上的事，許多俄國崩潰以前的現象都在重演，我們生活的經驗對西方極為重要，但我不相信你們真能接受，除非事到臨頭。

麥：可否舉例說明，你所謂俄國經驗在西方重演的意義。

索：可舉例子很多，就如年長的一代把知識領導權退讓給年輕一代。這違反了事物自然法則。較年輕和經驗少的一代，却在指導社會生活上具有最大影響。這幾乎成了時代的潮流。輿論界的趨勢是，那些有權威的人，著名的教授，科學家們，就算持有不同的意見，也不願參與辯論。提出反對的意見會被視為是尷尬的事。最好免被捲入。結果形成某種責任

知識領導
權的退讓

七

的放棄，尤其在這種有完全自由的地方更是普遍。比如說報紙、作家、記者，這些人享有很大的自由，而同樣的俄國也享有很大的自由。西方對革命前的俄國有完全錯誤的看法。在享有如此大的自由時，記者和作家在其歷史和人民前應有責任感。可是現在却到處是對革命份子的諂媚。愈是如此，他們越極端。這正像革命前的俄國，就算還未崇拜社會恐怖，但至少強力衛護了恐怖分子。那些具有良好地位的人，知識份子、教授、自由份子，用了極大的努力、忿怒、義憤在保衛恐怖份子上。隨後政府權力就此癱瘓了。類似這種例子還有很多。

麥：正如你所說是西方使像你這種人能够生存。你可以說說你在西方這兩年，在觀念上有那些改變。你顯然比剛來時悲觀多了。

靠自己才能獲自由

索：我這一代與西方的關係，我不準備說我個人，當我說我這一代，我所想的是那些分享我命運的人，也就是那些二次大戰中的士兵和囚犯們。畢竟這是許多人共同的命運。正如我所說，我這一代經歷了幾個階段。在五十年代大戰結束後，我們真是崇拜西方。我們把西方視爲自由的太陽、精神的堡壘、我們的希望。我們都知道自我解救很難，但却認爲西方會幫助我們從奴役中站起。漸漸的，經過了幾十年，這種信心開始動搖和消逝了。我們經過許多困難才能接到西方的消息。但在強烈的干擾下我們仍試圖去收聽。比如說你們的英國廣播公司臺。我們在迷惑中明白，西方對自由並不太堅定和關心，對我國也一樣。西方好像要把

其自由與我們的命運分開。在我被放逐之前，我已經對向西方求助是否實際抱有極大的懷疑。這也是我與沙卡洛夫意見最不相同的地方。沙卡洛夫認爲西方的幫助對我們自由化具有絕對的重要性，而我却認爲只有靠自己才能獲得自由。實際上不能對西方抱着希望。我來到這裏後，這種疑慮，不幸的增加得很快。當然主要原因，西方在這兩年經歷了不少事情，在這兩年西方對東方的關係上變得更弱了。西方做了如此的讓步，現在要重演使我免於被囚的憤怒運動，實際上已不可能。我願說，要求沙卡洛夫到斯德哥爾摩的運動也幾乎一樣強烈，但無論如何，却引不了作用。這段期間西方自己變得軟弱，它的地位變得更弱。莫斯科對西方極端的輕視了。

麥：容我這樣說，你自己的難題就是，你成了西方受人爭議的人物，你不再是西方的沉默遊客。在某些方面，你是熱心的批評者，而我想西方批評你的人，當然，不全部都如此，認爲你想在俄國找回某些根本不可能的事物，想回復到父權式、傳統式的俄國。這些批評你接受嗎？

新聞界缺少責任感

索：這是新聞界缺少責任感的結果之一。新聞界對其判斷沒有責任感。下的判斷和標題都是信手拈來。庸碌的記者以其結論做些頭條，突然就成了西方的普遍意見。你剛才列舉的幾個說法，事實上全是不真實的。第一、我不是西方的批評者。我願重申幾乎我們一生都在崇拜西方，注意這個字「崇拜」，我們不只「羨慕」它，我們「崇拜」它。我不是西方的批

評者。我是西方弱點的批評者。我是對某些我所不明瞭事物的批評者。一個人失去了精神力、意志力、怎能保有自由呢？西方不去珍惜它，不去爲它犧牲。第二項貼在我身上的標籤也很常見，說我想回到父權式的生活方式。不過據我看，除了呆癡的人以外，沒有一個正常人會提議回到過去，因爲任何正常人都知道，人只有向前走。也就是說，只有在前進而非後退的運動中才有選擇。很容易想像某些記者，寫的大多是女人時裝，會想出這個頭條，所有故事都在說我要回到父權式的生活方式打轉。我願再舉個例子。就以「國家主義者」這個字來說吧，它變得幾乎毫無意義。它時常被引用，每個人都濫用它。但什麼是「國家主義者」？一個人認爲他的國家應該有支大軍，征服鄰近的國家，應該擴張其帝國，這種人被稱爲國家主義者。但如果相反的，我認爲我的國家應該解放它所征服的所有民族，應該裁軍，應該停止所有的侵略行動，我是什麼人？一個國家主義者。如果你愛英國，你是什麼人？就是個國家主義者。什麼時候你不是一個國家主義者呢？當你恨英國，那你就不是一個國家主義者了。（意指國家主義者應以其愛不愛國來判斷，而不是以愛國方式來判斷，軍國主義者不一定比和平主義者更「國家主義」）。

麥：你剛才已很雄辯的表達了你的觀點，說你不會回復到古老俄國帝國主義。但我不太明瞭你所宣稱的「向前走」，如何才能解決你所深刻形容的「蘇聯內緊張壓制的世界」。如果西方無法幫得上忙，什麼是俄國人民前進之路，什麼將會發生？

索：你剛剛用了個字眼「爲我們」，你的意思是指蘇聯，對嗎？你知道，二、三年以前，這個問題是切時的，那就是說，可以相信我們蘇聯的居民能够坐下來考慮我們的前途。蘇維埃領導階層經歷了如此多的困難和失敗。它必須找到一條出路。實在我認爲出路應是條漸進的道路，當然不是革命的道路，不是一次爆炸。這次在這點上，沙卡洛夫和我意見相同。一個漸進溫和的道路可以提供這可怕制度一個出路。不過，今天所有這些提出的解決，已失去了其實際價值。過去兩年中，可怕的事已發生了。西方放棄了不只四、五、六個國家，西方放棄了它所有的世界地位。西方如此輕易放棄一切的事，做了如此多的事來加強我國的暴政，使得今天所有這些問題已不再與蘇聯有關。反對派依然存在。但是正如我說過多次的，我們反對派的運動和精神再生，就如同任何精神過程一樣，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但是你們的投降，却像所有的政治過程一樣，進展的非常快。你們投降的速度，如此快的超過了我們道德再生的步伐，使得目前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使極權主義更擴張。我想這樣更適當，如果不是你問我「俄國」或「蘇聯」（讓我們不再把兩者混爲一談）會走那條路，而是我來問你西方將會走那條路。因爲目前問題不是蘇聯會如何擺脫極權主義，而是西方要如何避免同樣的命運。西方如何有效對抗空前的極權主義力量，才是問題所在。

麥：你爲什麼覺得，西方人對你感到不自在。這也使我問，有關剛才所提的精神道德再生的問題，你的中心觀點是什麼？你一生經歷了許多巨變，你曾是一個老師，一個勳隆的戰

鬥英雄，蘇維埃陸軍軍官，你曾是個癌症病人，一個集中營中的政治犯。你一切所說的，所代表的中心觀點是什麼？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索：如果要談我的一生經驗，我願說我對生命的看法大部份形成於集中營。我生命的這部份反映在「古拉格羣島」中。我不知是否如你所說的，西方聽眾會對我的話感到困擾，我難以去判斷這種反應。但我願這樣說，那些生活在最可怕情況下，處在生死邊緣的人們，不管他們是來自西方，或東方他們都會瞭解善惡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善惡絕不會合為一體。

一個人如果忽略了其間的區別就無法建立其生活。我對實用哲學常常鄙斥道德考慮感到驚異。目前西方報界常常坦白宣告一項原則，說道德考慮與政治無關。它不應適用，也不應被適用。我願提醒你，一九三九年英國就不是如此想，如果道德考慮不適用於政治，那就很難理解為何英國要對希特勒德國作戰。實際上你們可以避免捲入的。但是英國選擇了道德之路，她向世界顯示她經歷了其歷史上最光輝英勇的一段時期，但是今天大家已忘了這點。今天英國政治領袖很坦白的宣稱，他們不但承認任何地區的強權，不管其道德品質，甚至還要急著去承認它，想要第一個去如此做。在某些地區的某個地方。在寮國、中國、安柯拉已失掉了自由。暴君、土匪、傀儡奪取了權力。實用哲學却說「那沒關係，我們必須承認他們」。更重要的是，一國人決不能認為自由的偉大原則僅及於自己的疆界。只要自己有自由，別人管他的。不，自由是不可分割，並須對它抱着道德態度。可能這是主要意見不同的地方。

麥：你提到「古拉格羣島」這部你在史達林監獄中最著名的生活記錄。這部書中充滿著強烈的怨憤和痛苦。它的目的只是為了摧毀共產意識型態，或至少打破它的神話，還是有其更深的意義和作用呢？

索：藝術作品包括有許多部分。它有許多層面、許多角度、亦即許多目的。藝術家不能侷限於政治目的上，只想著去改變一個政治集團。這只能以附帶的作用出現。但是去對抗虛偽、謊言和神話，去對抗有害人性的意識型態，去為我們的記憶而戰，為我們記憶中的真相而戰，那就是藝術家的任務。一個不能記憶的民族就沒有歷史和靈魂。是的，主要就是重現。當我坐下來寫這部書。我的唯一任務，就是重現所有發生過的事。那是我主要的目的。當然裏面可以導出許多推論。今天如果三卷「古拉格羣島」能在蘇聯廣為發行，所有人可以由購閱，那麼，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沒有共產意識型態能夠存在。因為讀過全部這些並瞭解它的人，思想中根本就沒有共產意識型態立足的餘地。

麥：在你最近的一本書中，你指述了列寧在蘇黎世的形象。很多人都發現，你倆有些相同之處。你描述了一個堅強的人物——列寧，却對俄國內部的事件無能為力。他被隔絕、孤立、急躁。這倒蠻像你，一個堅強的人物，今天住在同樣的一個西方城市可能也一樣無能為力，切斷了與蘇聯友人的連繫。當你後半生中蘇聯發生巨變的時候，你會像列寧一樣驚奇嗎？

索：你知道我在列寧的形象下工作了四十年。在我構想這一系列書時，我把列寧視為中

為民族記憶而戰鬥

心人物之一，就算不是唯一的中心人物。我收集了可得的每點資料，每一細節。我唯一的目的就是重現一個真實的他。

麥：但是攻擊了列寧，當然，你就攻擊了蘇維埃政府和布爾什維克整個系統的合法性。所以我問你是否有天會，一如列寧過去所做的，成爲革命和蘇聯內道德精神再生的中心？這種精神再生會不會到時候推翻共產制度？

索：我並不攻擊列寧，我只是描寫真的他和他的份量。有太多的香火圍繞在他身邊，在貴國內也是如此。他被抬舉到了頂峯，我以事實說明他是如何的常常短視、他如何對待其盟友與夥伴、他與自己國家的聯繫是多麼的微弱。我不是攻擊他，而是攻擊這個意識型態。我憎惡這個意識型態，我國的精神復興要靠我們從這個天譴的、致命的意識型態中解放出來。

麥：我的意思是說你和列寧比較起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也是在蘇黎世等待，對國內的事無能爲力，當變化來時相當驚異。雖然他是個偉大的革命者。如果變化來了時你會驚異嗎？

索：他驚異是因爲他短視，你從我書中就可看出。由於黨派觀點的狹隘，他看不出最簡單的事實。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不知所措。同時對革命也是如此。二年前我不指望蘇聯會發生任何爆炸，我希望的是一種緩慢的進展，那已經在發生。是的，今天我會驚異。但是對某

些別的事我却不會驚異。我願再說清楚點，目前的情況是，蘇聯的經濟處於如此的備戰狀態，就算所有的政治局委員都同意不發起戰爭，那也不可能了。要避免這個，必須經歷從龐大戰時經濟到正常平時經濟的痛苦轉變。目前情況是，不要去想什麼事會在西方突然發生。西方自己造成面臨於崩潰邊緣。這自然使得這個問題成爲你們的，而非我們的問題。

麥：你以一個虔誠基督徒的道德觀點指出這些，而且對你來說，真理比結果重要。但是這對核子時代下的人們近乎苛求。刀懸在每個人的頭上。核子武器的電子威脅等。我想這就是你被批評爲和解之敵所面臨的問題。與魔鬼打交道時有何權宜之計，如果目的是爲了避免核子大戰？

和解成了 自我欺騙

索：你知道在五十年代有段時間，這種核子威脅籠罩着世界。但西方態度却堅若磐石。西方並未退讓。今天核子威脅仍然籠罩著雙方，但是却選擇了退讓的錯誤之路。蘇聯甚至不須發動核子戰爭。你赤手可得之物，還要什麼核子戰爭，他們就輕而易舉的可以得到。今天和解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沒有意識型態的和解。你們西方人就是無法抓住蘇維埃宣傳的要點。今天你們仍然是英帝國主義，企圖要壓制整個地球。這些都隱藏在和解的薄膜下。揭去這層薄膜只要一個早上。僅僅一個早上。你們却不可能如此輕易背離和解。改變你們目前的立場需要一年或二年。但在蘇聯，一個早上，一個命令就夠了。報紙登出消息說英帝國主義已變成如此無恥，情況不能再忍受。每天對你的口誅筆伐從不矛盾。至於和解，根本就沒有和

解。那早就消失了。我們不能提出沒有意識型態的和解問題。如果新聞界言論從頭到尾都在憎恨鄙斥你，那是什麼和解呢？你被視為一個暫被容忍的惡徒，不錯，可能再多一天。這不是和解。至於赫爾辛基精神，容我問個問題好嗎？你如何去解釋，比如說，在過去幾個月幾乎沒有什麼關於蘇聯繼續迫害反對份子的消息？對不起。讓我自己來回答。我知道有一個事實。在莫斯科的西方記者，已被准許有較為自由的行動權。爲了要報答這點，並且因爲赫爾辛基精神，不再有報導蘇聯內新的迫害反對份子的消息。赫爾辛基以及和解精神，對我們蘇聯內的人有何意義？不過是極權主義的加強。對你們似乎是種溫和的氣氛、溫和的表象，對我們却是極權主義的加強。比如說，我願舉幾個你不會從報上聽到或讀到的新鮮的例子，可以嗎？有個人去拜訪沙卡洛夫。他在坐火車回家的途中被殺了。不是你，是他被殺，一個蘇維埃公民。有人去敲尼可萊·克里可夫的門，他們說來修瓦斯，他開了門，他們在他家幾乎把他打死。因爲他爲反對份子辯護並簽抗議書。這些都發生在公寓裏。但是在大街上，在波斯派克特地方，勒娜·馬弗蘭娣被抓着拖入一輛汽車。她叫道「公民們，我被綁架」。幾百經驗的人都聽到，但大家都怕，因爲任何人都會被那樣逮捕。就在路人的正眼睜睨下，他們把她推進了汽車，並且關入監牢。那就是我們的赫爾辛基以及和解的精神。事情還不止此。在放得薩，維契斯洛夫·古諾夫因持有非法刊物被捕，他被關入瘋人院。這就是你們所有的和解和赫爾辛基精神。

麥：西方從五十、六十年代，可能到今天都有一種很強烈的感受。事實上偉大的英國哲學家羅素也支持這種看法，即「赤化總比死來得好！」你認爲和解政策是不是蘇維埃政府所促成，刻意爲了防止內部的自由化呢？換句話說，蘇聯在經濟上落後，爲了要趕上它，必須輸入美國和西德技術，否則它的整個制度就會瓦解。因此它只有自外國輸入技術並且在內部採取高壓。

「士可殺
不可辱」

這裏面有幾個問題，是的，技術的輸入解放了蘇聯。這是真的。我再來談羅素這個可怕的聲明。我實在不瞭解羅素爲什麼說「赤化總比死來得好！」他爲什麼不說褐化總比死來得好！那沒有什麼不同，我和我這一代人的一生，那些分享我看法的人的一生中，都持着「士可殺不可辱」的格言。羅素這個可怕的聲明，完全缺乏道德的標準。從短期看，這句話可使

人苟且偷生，但從長期看，它必將毀滅有這種想法的人。它是種可怕想法，我倒謝謝你引用這個駭人的說法。

麥：但是照你的要求，會不會回復到冷戰的緊張狀態呢？大部份的人都認爲和解是一種喘息而歡迎它。鬆了口氣，總是不同了點。你是否同意你所標榜的選擇，會是有如史、赫時代的緊張狀態呢？

索：我要強調的是，你認爲這是一種喘息。對於我們（指蘇聯）則根本不在喘息。我們反以更大的決心在進行。你提起五十年代的緊張，但是不管那種緊張，你們絲毫沒有讓步。

今天你不必是個戰略家，就可以看出安柯拉被擄取了。爲什麼？因它是最好發動世界大戰的最近據點之一，大西洋上的最佳據點。蘇維埃的武力在許多方面已超過西方。在其他方面也將要超過。以海軍來說，英國以前有支海軍，現在則是蘇俄有了海軍，控制了海洋、基地。你可稱此爲和解，要是你喜歡。但是從安柯拉以後，我不知一個人怎麼還能說出這個字。你們國防部長會說，在赫爾辛基以後，蘇聯「通過了考驗」。我不知道還有多少國家要被佔領。可能要蘇俄坦克來到了倫敦街頭，你們的國防部長才說，蘇聯最後通過了考驗。還是他們仍然在坐着觀望？我認爲根本就沒有和解這回事。和解是必須的，但却必須攤開雙手和解。顯示你手中沒有石頭，但是你們打交道的對方，却在手中有塊石頭，而且重得可以一擊致你死命。和解因此成了自我欺騙。那就是整個的真相。

麥：我願最後問你，做爲偉大的俄國愛國者，你對自己前途的看法如何？

索：我的前途與我國家的前途緊緊連結。我工作，並將永遠爲她工作。我們的歷史被隱瞞，全被歪曲。我試圖去重建這部歷史，主要是爲了我的國家。可能它對西方也有用。我的將來要看我國家的將來會如何。可是此外，莫斯科領導者必然視我爲眼中釘。所以我的命運可能在我的國家命運被決定前就被決定。當然，他們可能試圖完全消滅我，在我國家的命運變得更好以前，我有時也得到那類的消息。當我來到這裏，我預計可以很快回去，因爲那時候蘇聯是那麼弱，而西方却強多了。但是過了這兩年，雙方的關係已大大的轉爲對蘇聯有利

了。

麥：索忍尼辛先生謝謝您。

民主與共產之危機

關 中

——索忍尼辛訪問記之介紹

編者按：中國電視公司六月十日曾推出「索忍尼辛訪問記」之專題節目，有關索氏之思想背景與訪問中辭意需要解釋之處曾由關中教授予以說明。以下是關教授介紹部份之全文。

民主國家必須堅守原則

索忍尼辛是西方文明重振的一位先驅勇士。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均是西方文明的產物，但今日這兩者均產生了危機，索氏認為民主主義的危機是忽視道德，而共產主義的危機是無法阻止其內部自由化的發展。

首先就西方的道德危機來說，索氏指出在二十世紀，善良與邪惡這些字眼在西方已被認為是陳舊的觀念，但事實上善惡之間是有區別的，而且是必須加以區別的，所以他不能接受道德與政治無關的說法。索氏說一些現實主義者對暴君、土匪或傀儡取得政權後的態度是「那有什麼關係，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索氏認為這是不了解自由不能分割的道理，任何負政治責任的人不能自己享有自由，而無視別人失去自由。索氏指出民主是西方政治的特色，但民主國家的人民如果沒有法治的觀念，甚至濫用自由

，民主制度本身必然會遭受極大的損害。他強調民主國家必須要有目標，也要堅守原則。這些目標與原則就是道德，不但在法律之上，甚至在國家之上。所以，索氏認為民主國家對共產極權的同情與安撫便是道德的淪喪。

再就共產主義的危機來看，索氏認為整個共產主義是建立在虛偽、謊言和神話上。他認為馬克斯主義是不科學的，他認為共產主義的教條不但戕害人性而且阻礙社會的進步。以對內政策來說，索氏沉痛指責蘇俄政治與經濟的失敗。索氏指出，蘇俄的每一件工程的花費均遠超過其本身的價值。以對外政策來說，索氏指責蘇俄肆行侵略。與風作浪，他對蘇俄與共匪的衝突，認為只不過是「一方主張在列寧書中的五三三頁，另一方則強調為在三五五頁」的爭執而已。索氏認為蘇俄在對外關係上最大的失敗便是迷信教條，扶植共產極權，結果却造成新的敵人，索氏認為蘇俄人民之反抗共產主義，是一種「精神復興」的運動，是不會停止的。但這一過程之快慢與西方的態度極有關係，如果西方幫助蘇俄強化其控制，這一過程自將緩慢，但如西方對蘇俄強硬，這一過程便可能加快。

反對西方對俄和解政策

索氏對世局最基本的一個看法便是反對西方對蘇俄的和解政策。索氏並不是反對和解本身，而是反對西方和解的方式以及若干對蘇俄錯誤的前提與假定。索氏認為只有思想上的和解，才是真正的和解，同時，真正的和解不祇是停止戰爭，也應包括一個國家停止其內部的暴行。索氏認為西方的幾項錯誤前

提是：一、所謂蘇俄業已放棄思想鬥爭。二、企圖利用蘇俄內部的所謂「自由派」的力量。三、對民主與人權的雙重標準。四、認為退讓可換取蘇俄的合作。爲了反駁這些錯誤，索氏指出：一、冷戰並未結束，事實上，蘇俄已贏得第三次世界大戰。二、蘇俄與西方和解主要的目的在取得西方的技術。三、和解業已強化了蘇俄的國際地位及其對內的控制。四、和解事實上出賣了東歐的國家。結果是和解使西方面臨最嚴重的危機。索氏語重心長的說：「擺在眼前的問題不是蘇俄人民如何擺脫極權的控制，而是西方國家如何避免陷入蘇俄人民相同的命運。」

總而言之，索氏認為二十世紀人類面臨的最大課題就是如何對抗共產主義。不幸的乃是生活在鐵幕之外的人，對共產制度所帶給人類的災難似乎不願深入了解，甚至還要尋找理由爲其存在而辯護。索氏以他的著作與言論告訴了我們共產制度是多麼的可怕，自由是多麼的可貴。索氏告訴美國人民，歷史的發展，使美國成爲世界的領袖，面對世界的危機，美國不能短視，也不能懦弱，更不能找尋藉口而逃避其責任。索氏最感人的一句話是「我們在蘇俄生來爲奴隸，但却不斷追求自由；你們在美國生來就享有自由，但你們却在幫助極權暴政奴役美國及自由世界。」我們希望任何有理性的人，會冷靜地體會索氏的讜論，從而有所反省，堅定反共的信心，並努力爲反共大業而貢獻一切。

主由蘇俄內部推翻暴政

在此一索忍尼辛的訪問中，有三處比較辭意含混，需要補充說明的地方。一是索氏有關「國家主義

者」的解釋，索氏認爲真正的愛國者不是支持自己國家侵略其它國家，征服其它民族，甚至爲了這些目的而壓迫自己的同胞。真正的愛國者乃是對國家有感情，致力使國家開放與繁榮。索氏爲一偉大的愛國者，他反對的是蘇俄的共產暴政，而非蘇俄本身。索氏對俄國「精神復興」的基本態度是必須由蘇俄內部來推翻共產極權，而不能完全依賴外力，所以他寧願留在蘇俄境內而不願出國，這點是索氏承認他與蘇俄另一位人權鬥士沙卡洛夫意見最不相同的地方。一九七〇年，索氏以「癌症病房」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蘇俄當局曾允許他前往領獎，但條件是不得回到蘇俄，索氏因而放棄出國領獎。索氏一九七四年二月離開蘇俄是被放逐的，而非自願的。故索氏強調他如今只是流亡，所以不會快樂，只有回到蘇俄，才會感到快樂。他認爲他的前途與蘇俄的前途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一位在美國的蘇俄詩人曾感慨地說：「索氏被放逐後成爲一個沒有國家的人，而蘇俄放逐索氏後成爲一個沒有人的國家。」

另一點是索氏對蘇俄歷史的看法。他認爲蘇俄的歷史已被蘇俄共產黨掩飾及曲解，他要努力重寫蘇俄的歷史。事實上，他正在着手撰寫蘇俄革命史。他認爲歷史上某些階段經常發生重大的事件。但這些階段往往在當時不能顯示其重大意義，而必須要等到十年或二十年後才能被充分了解。他對這種重大事件發生的階段稱之爲「結」，所以他的蘇俄革命史將以第一結、第二結……等方式來敘述。

美須謀求有效對俄措施

第三點是索氏批評美國在和解過程中尋找藉口而逃避其責任的例子。也是在訪問中索氏所指西方向

蘇俄投降的速度，超過了蘇俄內部要求自由化的步伐，所以他特別強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必須要謀求積極有效對抗蘇俄的措施。索氏在一次對美國人民講演中指出，美國常常挑剔若干盟國的內政，索氏問到在對抗極權第一線的地區，有那一個政府能維持全面的民主呢？你們美國能嗎？針對美國放棄越南時，宣稱越南本身已喪失其保護自己的意志的說法，索氏指出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國家自我保護的意志尚不及越南。索氏對自由世界的忠告是自由世界對抗共產極權必須堅定信心團結一致，不能各行其是，自亂陣腳。（原載六十七年六月十五日中國時報）

時代的獅吼 · 歷史的證言

· 中央日報 ·

——論索忍尼辛對西方的逆耳忠言

自我放逐的蘇俄小說家索忍尼辛，八日在美國哈佛大學第三二七屆畢業典禮上發表重要演說，痛斥西方各國勇氣衰竭，精神貧乏，已瀕臨自我毀滅的危境。

索忍尼辛是當世最著名亦最傑出的作家，憑他爭人權、反共產的鋼鐵意志，以及厚重悲沉的文筆，贏得了一九七〇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更得到自由人類普遍的景慕崇拜，被尊為「二十世紀的良知」。他自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被蘇俄強行流放，送出鐵幕，曾一度客居瑞士。近年在美國卜居。八日在哈佛的演說，是他經過近兩年的沉默之後發出的獅子吼；以索氏的聲華見識，立即引起全世界的重視。其演說重點已見昨日日本報。

一位偉大的作家，必須能代表時代的心聲而發言。誠如索忍尼辛過去所強調者：「我的心地清白坦蕩，因為我已盡了作為一個作家的責任，無人能阻絕真理之路。為真理的闡揚，我不惜獻身一世，我的著作，對千秋萬世，是非善惡，可作為歷史的見證。」索氏最近的一篇演講，義正辭嚴，觀察深刻，不惟足當「歷史的見證」而無愧，更乃是在此滔滔亂世、處士橫義之際，最真切亦最公道的一聲沉重警鐘。

何以是勇氣衰竭，道德淪喪，精神破產？證據太多太多。世人特別感到切膚痛心的最明顯的事實，也就是索忍尼辛痛予譴責的一點：西方國家的政府官僚，「在與那些無法提出抗拒的弱政府打交道時，態度頑強；但在與那些強大的政府和具有威脅性的勢力、與侵略者和國際恐怖分子打交道時，却張目結舌，四肢癱軟。」

西方國家的政客官僚和某些喪心病狂的左傾無知知識分子，在指責大韓民國、印尼、智利、以及其他「弱小政府」時，都會放言高論，侃侃而談，道理一大堆，手段一大套。然而，面對那真正威脅世界安危、人類存亡的大敵時，則不是視若不見，噤若寒蟬，就是曲意承歡，阿諛奉承。那種卑怯的醜態，更何止「張目結舌，四肢癱軟」而已！

中共偽政權屠殺了多少善良的人民？蘇俄禁錮了多少「精神病患者」？今日的中國大陸和蘇俄、東歐，都已成了不折不扣、悲慘萬狀的古拉格羣島——人類有史以來最大也最黑暗的監牢。西方作了些甚麼？那億萬人民正在血枯淚盡的苦難之中呻吟呼號。西方國家的領袖們却還沉溺在「關係正常化」與「和解」的迷夢中，自欺欺人。已經被美國人民唾棄的尼克森不足論矣；到今天，布里辛斯基之輩不是還在高彈「長遠戰略利益」的曲調，要與殺人如麻的共匪「正常化」嗎？

甚麼「關係正常化」？索忍尼辛說得一針見血，美國如果與共匪建立關係，那必然是「註定失敗的邪惡聯盟」！勇氣衰竭、道德淪喪，就是滅亡的開始。他提出警告說，下次世界大戰「很可能永遠埋葬了西方的文明」。兩億二千萬人民的美國，應有足够的智慧、勇氣與決斷，不至於淪為第二個高棉。

這決不是危言聳聽。西方的病態，除了政治領袖的短視怯懦之外，還有「法律體制無效，新聞界膚淺而權力太大，而一般人民已被物質財富所腐化。」這些話，也值得我們反省警惕。

我們含着熱淚，向索忍尼辛先生致敬最高的敬意；同時更因此而為我們擁有堅強、睿智、英明的領導為榮。在面對共匪邪惡勢力挑釁之時，無論遭受多少打擊、屈辱、誤解、和誣蔑，我們中國人民永遠是昂頭挺胸、奮鬥向前，英勇沉着，百折不回。我們豪情萬丈，勇氣奮發，以中華民族堅忍弘毅的精神，三民主義救國救世的方略，展開以仁克暴的戰鬥，爭取中興復國的勝利成功。

索忍尼辛以他的文章議論為歷史作見證；我們則要以我們的血、汗、淚所創造的勝利，為人類開創自由安全、和平進步的前程。（六十七年六月十一日中央日報社論）

再論索忍尼辛的證言

· 中央日報 ·

二八

索忍尼辛本月八日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對西方社會的日益軟化、腐化，有如徬徨迷惘時代中的獅子吼，發生了震撼一世、喚醒迷覺的影響；同時，也引起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本報早曾擇要刊載並予評論。索忍尼辛遠離了他自己的祖國與故土，他不代表任何政府、政黨、或任何團體，他代表的是二十世紀人類在苦難中飽受煎熬而出自良知的抗議。他祇是一個孤身異域的流亡作家，他不能指揮一兵一卒。他的手祇用來完成血淚交灑的創作；然而，他的口誅筆伐，却不亞於那些能够按一按電鈕就可發射洲際電導飛彈的權威。他的威力來自人類渴望自救互救的良知。

核武器祇能破壞有形的物質與生命，索忍尼辛的話，却是直指心靈。他要從人的心靈深處拔除一切的暴政與偏執，更敦促自由人從道德淪喪、勇氣衰竭的危機中醒來。他這一番對症下藥、痛加針砭的大議論、大撻伐，應值得茫茫衆生的感念。他所斥責的，絕不僅是某些西方人士而已。「不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我們自己也正是在接受這愈寒愈奮的考驗之中。

更重要的是，我們不僅要能經得起考驗，更要能在共產邪惡勢力日益囂張、西方民主國家過一日算一日的大難浩劫之前，爲自己也爲全人類，開創一條光明正大的出路。我們應有此自信，也應有此勇氣與抱負。

我們感謝在哈佛參加那一集會的王紹陵先生，將索氏以「一個分裂的世界」爲題的講辭全文譯出，並寫下聽衆的反應與他自己的感想。本報自廿四日起連載三天。這是一篇忠實、生動、而深入的報導，索氏對西方的逆耳諍言，因此文可使我們得到更完整的印象與瞭解。

在西方，這篇演講已引起了熱烈的反響與不同的議論。有許多以「自由派」相標榜的報刊，指責索氏「不瞭解美國的生活方式。」卡特總統夫人也認爲索氏的評論偏於悲觀，「十分刺耳」。我們的看法是那些批評索忍尼辛的意見，顯然都有避重就輕、沒有抓住主題之嫌。索氏所嚴詞譴責的西方病徵，諸如道德勇氣的淪喪，玩弄法律文字，真知灼見之士難展長才，個人權利的濫用，新聞界的濫用自由，知識界爲時尚所左右，姑息投降心態的盛行，對世局的短視等等，無一不用許許多多的事實爲證。面對這些事實，反駁者都無法提出具體而有力的反證。「除非瞎了眼，任何人都看得出來，海洋已不屬於西方，西方控制下的陸地也在日益縮小。」非洲近來的烽火，把這種權力消長帶進了一個新的階段。

然而，更嚴重的是：「我們已失去最可愛的財產——精神層次的生活。在共產國家，它毀於專政的共黨；在西方，它却被商業利益所窒息。」

由美國倡導的人權運動，在政治上與道德上應是有力的號召；但是，人權運動如果祇是「選擇性的」，祇是推行多種不同的標準，則無論這種運動的口號如何響亮，旗幟如何鮮明，仍將祇是一場虛偽的鬧劇。美國負責推動所謂人權外交的人，到現在不曾因共匪歷年來的大屠殺、大迫害說過甚麼話，是否認爲肆意摧殘人權的共匪有「權」超越乎人權運動之外？還是基於短視與現實的利益，在替共匪故意作

掩護？

或者說，美國正在「聯匪制俄」，從「戰略觀點」，目前對於共匪的倒行逆施祇好曲容緘默。果真如如此的話，根本就是澈頭澈尾的懦夫，那配手舉重振道德勇氣的旗幟？索忍尼辛大聲指斥的「與魔鬼聯盟」，豈不是說得正合事實？

我們和許多評論者抱同樣的見解，我們並不一定對索忍尼辛所說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表同意；然而，他所提示的大原則、大方向，我們都全力支持，深獲我心。我們熱忱希望當世之人，無論西方也好，東方也都能作理性的反省！

王紹陵先生建議邀請索忍尼辛到我國來訪問。據我們瞭解，自從他離開鐵幕之後，我國文藝界就多次向他提出邀請。由於索氏有他自己的寫作計畫而未能成行。相信文藝界會繼續聯繫；我們更相信，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索氏之於我們，可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他的堅忠奮鬥和一心一意獻身於反共復國大業的中國人民常在一起！（六十七年六月廿六日中央日報社論）

「索忍尼辛訪問記」觀後

張瑞麟

六月十日晚間，中視將英國廣播公司製作的「索忍尼辛訪問記」播出，從八至九點，整整一個小時，沒有擾人的廣告，沒有令人反感的妖聲嗲氣。內容相當精采，充滿索氏的那種憂國憂民的情操與正義的呼聲，看了由不得你不擊掌叫絕。

索氏被他的國家開除國籍、驅逐出境後，流亡西方，先是客居瑞士，後復下榻美國，輾轉兩年過去了。這兩年之中，他對西方國家對蘇俄的低姿態：對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受到壓抑的人民，及西方社會的種種現象，都表現了又深沉又憂憤的反應。

西方以美為首的幾個國家，近年來屢次對蘇俄讓步，索氏說，表面上是和談的步驟，實質上是西方國家勇氣的衰落，它正呈現西方亦將為蘇俄所毀滅的徵候。而許多西方的國家領袖却懵然不知。越南、高棉、安哥拉等等，都是活鮮鮮的教訓，在當時，西方國家却以讓他們自己治理自己國家為理由，間接的，不啻是參與執行百萬大屠殺的行徑，索氏的義憤，委實令人震撼。

他訪問他的記者：「近幾個月來，西方報界對蘇俄當局壓迫知識份子：逮捕作家、藝術家等不滿份子的揭發與斥責，為什麼忽然減少了呢？」索氏停了一陣子，接著說：「還是讓我來告訴你，」他說，「西方政府領袖與蘇俄的和談，「像你們強調的赫爾辛基精神」，雖然他使蘇俄政府放寬了對西方記者

、學人的限制，使西方在俄境內的記者得到了較多的自由，可是付出的代價，便是削減了蘇俄的內幕對外界透露。

然而，在蘇俄境內，人民受壓制的事實，却絲毫不減往昔。一些外界無法獲知的消息，像人民中會因曾是不滿份子的親朋，就無辜的遭受凌辱或逮捕的事件，真是層出不窮，而西方世界都一無所知，索氏說：「這也就是你們所謂的赫爾辛基精神！」

索氏認為，當前西方的社會，年輕而少經驗的青年一代，却執掌傳播知識與決定政策的責任，這並不是一種好現象。而且目前所表現出來的趨勢，像高唱「國家主義」者，及前時瘋狂的反越戰等情事，實在隱存著自我毀滅的危機。

索氏的言論，常為某些報刊給歪曲了，訪問記者問他，對某些新聞以大標題指摘他，說他有父權式的老社會思想等問題，他的反應是怎樣？索氏說，那些人對他的思想只有膚淺的瞭解，就以個人主觀的結論做為新聞的標題，就像他們在渲染時裝趨勢一樣，用的是同一個手法，這實在是很不負責任且庸俗不堪的做事態度。

西方國度，有很多學者名人指斥索氏，說他常攻擊他自己的國家，一些「國家主義者」也起而伐之。索氏反駁道，他不是攻擊俄國本身，而是攻擊蘇俄的共產主義制度。同時他說，「國家主義」這個名詞，被許多人濫用，他說「希望自己的國家去侵略鄰國，去攻佔弱國，這就是國家主義嗎？」索氏這一段言論，正是國父思想裏的民族主義精神，也就是濟弱扶傾的和平精神。

最後，索氏談及自由這兩個字，他認為西方的自由被錯用了，使得西方國家喪失了正義感與勇氣，自由必須抱持道德態度。索氏這個思想，不僅強調了「不侵犯到別人的自由才是自由」的真諦，同時在說明，要協助被剝削掉自由的人民爭取自由才是自由的精神。

這位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俄國自由鬥士，他所表現的正義感與良知，使得共產國家為之顛慄！生活於自由地區的反共志士，對索忍尼辛其人其事，相信每個人在暮鼓晨鐘的振奮之餘，還會懷抱著無限的欽佩與敬重。

正義這個永恆的真理告訴我們，索忍尼辛是不朽的。（轉載中央日報副刊）

勇者的證言

——追記索忍尼辛的哈佛演說 · 王紹陵寄自哈佛 ·

——原載中央日報

三四

王紹陵先生自美國哈佛大學寄此稿給本報，標題「勇者的證言」是他本人所訂。索忍尼辛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說，他是「在雨中含着熱淚」的聽眾之一；會後他根據自己的筆記，參考「哈佛大學校刊」所載索氏講詞全文，以及其他報刊，撰成本文。他說：「爲了存真，我儘可能用索氏原句。」

本文不僅記下索氏演說的要點與現場的情景，及本文作者感想，並且訪問了其他在場聽眾，記下他們的反應。全文一萬五千字，自今天起分三次在本版刊出。

作者在本文結束時提出一個建議，盼我們的文藝界在明年文藝節邀請索忍尼辛來華訪問。「我深信索氏會發現，中華民國比他的第一故鄉（蘇俄）與第二故鄉（美國）都更爲溫暖！」

——編者——

一、前言

傳說了一個多禮拜的消息，終於在六月五日——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的前三天——得到了證實：一九七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蘇聯作家亞歷山大·I·索忍尼辛（Aleksandr I. Solzhenitsyn），將打破兩年的沉默，前來哈佛接受榮譽學位並發表演說。

自從一九七六年夏天索氏移居美國以來，他一直在維蒙特州的一個小鎮迦文笛詩（Cavendish）閉門讀書，謝絕訪客。如果說，這是索氏對西方國家極度失望之下的一種反應，當並不爲過。記得索氏被蘇聯政府放逐，流亡國外之初，正逢和解政策（低盪 *deleante*）大行其道之際。索氏以他數十年（包括八年勞改營）對蘇聯政權本質的認識，強烈表示他對低盪的反對（他稱之爲「慕尼黑精神」）與對日益軟化、腐化的西方社會的不滿。

對於一心以爲鴻鵠將至、和平將臨的西方，尤其是美國，索氏的忠言實在找不到太多熱心聽眾。一九七五年他初次訪美，福特總統甚至還爲了忧心激怒蘇聯當局而拒絕邀請索氏訪問白宮。後來福特總統雖在輿論壓力下，補正了錯誤，索氏當然已經感覺到，儘管他的小說如「古拉格羣島」「癌症病房」在美國頗受歡迎，他的政治見解却相當不合「時尚」。回到歐洲後，索氏把他對西方社會的觀察，總結在一九七六年英國廣播公司的一次訪問中。索氏當時警告說：

「我們在蘇聯的抗議力量，像任何精神過程一樣，是緩慢的。可是西方世界對蘇聯的軟化與屈服，却像任何政治過程一樣，是快速的。……今天的問題，已經不是蘇聯能不能擺脫極權統治，而是西方社會如何避免墜入同一命運。……如果有一天西方突然崩潰，我也不會驚訝。」

三五

之後，他帶着一妻四子，再度來到美國，隱居在新英格蘭區的鄉間。

作爲一個充滿道德勇氣的人權鬥士，索氏的隱居並不代表退縮，而是待機而動。兩年來，美國與世界情勢的發展，似乎又使他興起了希望。卡特總統在「低盪」困難重重之際上臺，外交上以人權相號召；雖然天真有餘，歷練不足，但他能力排眾議，不惜激怒莫斯科，親筆寫信支援被迫害的蘇聯物理學家沙卡洛夫，至少顯示他個人對人權的執著。近月來美國朝野對蘇聯與古巴在非洲的擴張一致指責，似乎暗示美國開始理解姑息、讓步之不可恃。索忍尼辛在這個時候，藉美國最高學府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再度警告西方社會精神價值的淪落，道德勇氣的喪失，與外交上姑息主義的泛濫，實在是適時而睿智的決定！

頒授榮譽文學博士，是在上午的畢業典禮中舉行。這是哈佛創校以來第三百廿七屆畢業典禮。哈佛校長柏克(Derek Bok)稱譽索忍尼辛爲「一個勇敢的人權鬥士」及「繼承托爾斯泰與巴斯特涅克文學傳統的偉大俄國作家」。索氏以「一個分裂的世界(A World Split Apart)」爲題發表的演說，則在當天下午的校友大會(包括應屆畢業生及家長)中舉行。他以俄語發言，由他的助理艾白蒂女士即時口譯成英文。

二、索氏對西方社會的批判

在長達一小時餘的演講中，索氏以詩友的身分，痛陳西方社會的軟化、腐化與惡化。他開宗明義的說：

「哈佛大學的校訓是『求真』(Veritas 按：拉丁文)。真理的追求，如果不能全神貫注、鏗而不捨，它必然離我們而去。即使當真理離我們而去的時候，我們還可能產生已經獲得真理的錯覺。追求真理的過程，尤其是苦多於樂。我今天的演講中，也有許多逆耳的評語，但我要強調，這些評語出自一個朋友，而非敵人。」

索氏首先從文化觀點，指出今日世界的多元性，三分世界之說已不足以涵蓋。幾個世紀以來，小撮西歐國家開拓殖民地的成就，使西方產生盲目的優越感，衍生出一種不能欣賞其他文化的偏狹世界觀。進入本世紀後，雖然殖民帝國的衰落，不但劇烈的調整了它們與殖民地的關係，也反映出這種世界觀的缺陷；可是今天西方國家仍以自身的社會、經濟發展來作爲衡量其他國家進步的標準，可見西方國家的盲目優越感仍存在。

索氏接着列舉他所觀察到西方社會的種種病徵：

道德勇氣的淪喪

索氏指出：西方社會最令人震驚的現象，就是道德勇氣的淪喪。這種現象普遍存在於每一個國家、政府、政黨以及聯合國，尤以各國統治階層及知識份子最爲顯著，令人感覺到整個西方社會都已然如此

。這些人不但自身沮喪、消極、迷惘，更經常企圖在理論上把一些懦弱的政策強辭辯解為很實際，很合理，甚至於很道德。跟小國、弱國打交道時，這些西方國家往往疾言厲色；一旦面對大國、強國或國際暴徒，他們立刻就窮於應付，不知所措。

索氏認為，西方國家立國的一些原則，諸如民主、自由、及追求幸福之權，在晚近科技與社會的高度發展下，已經以福利國家的型態漸次實現。可是物慾的滿足永無止境。幾十年來西方社會只見無休止的劇烈競爭，却不見精神層面的發展。今天西方社會已經有能力在一個物質條件富裕的環境中培育下一代，可是也就因為缺乏精神意境的提昇，長於安樂的西方青年已經無法了解用生命保衛人類共同價值的意義，更不用說迢遙千里的到海外戰場上去犧牲了！

玩弄法律漠視道德

西方社會的第二個病徵，索氏認為，就是玩弄法律文字，忽視文字背後的道德精神。

索氏指出：西方社會以複雜難懂的法律，週詳的保障了個人的人權；任何糾紛，最後都是訴諸法律文字來解決；只要在法律上站住了腳，則無復他求。於是每一個人都把自己在法律上的權利，行使到極致。從來沒有人想到，即使在法律上已無可疵議，一個人在道德上仍然應該儘量自制、忍讓，以謀求社會的和諧。在西方社會中，一個石油公司為了壟斷能源，可以買下一種新發明的能源，阻止它問市而不違反任何法律。一個食品公司可以使用有毒的防腐劑而無法律責任。他們還辯說，反正沒人強迫消費者

去買呀！

索氏感慨的說：

「我在共產社會活了一輩子，深深了解一個沒有客觀法律規範的社會的確是可怕的。可是，一個只有客觀法律，別無其他規範的社會也沒有價值。……每當人的生活受制於技術性的法律關係的時候，道德必然不彰，人類高貴的情操必然癱瘓。在危機四伏的二十世紀，一個只有法律的社會是經不起時代考驗的。」

庸才每當首選

索氏心目中，西方社會的第三個病徵，是眞知灼見之士，難以一展抱負。一個政治家即使在推行有益社會的政策的時候，也往往必須小心翼翼得到了膽怯怕事的程度。因為永遠有許多不負責任的批評家會吹毛求疵，永遠有國會及新聞界扯他後腿。他必須把每一個步驟都做得無懈可擊。一些志大才高之士，往往在重重限制之下，有志難伸。於是，在「民主政治必須制衡」的藉口之下，庸才反而每當首選。

個人權利的濫用

第四個病徵，是個人權利的濫用。索氏感覺到，西方社會對人權的保護，已經到了使整個社會對某些人完全無可奈何的地步。今天西方社會真正須要強調的，不是人的權利，而是人的義務。因為西方人

對權利的濫用，已使西方社會逐漸墜入罪惡的深淵。比如說，充滿色情、犯罪與恐怖的电影，事實上是對青年的一種道德犯罪，可是却被認為是自由權的行使。因為有人會辯說：「年輕人可以不去看，就是看了也可以不接受嘛！」在這樣一個只有法律，沒有道德的社會，如何能抵禦邪惡的侵襲？另一方面，目前的法律（尤其在美國）在保護人權的同時也保護了犯罪。每當政府要嚴辦恐怖分子之際，輿論就會指責政府侵害恐怖分子的人權。這或許就是西方國家的犯罪遠比共產國家為多的原因吧！

新聞界喪德濫權

第五個病徵，是新聞界濫用新聞自由，忽視社會責任。

索氏指出：新聞界在運用充分的新聞自由的時候，所顧慮的也只是有無在技術上違反法律條文而已。對於歪曲或不平衡的報導，似乎絲毫沒有道德責任。當記者以不實的報導或錯誤的分析誤導了社會或政府的時候，我們從未見到報社或該記者本人出面公開更正或認錯。因為這樣做會影響報紙銷路。於是國家成了受害者，記者却逍遙法外。

索氏認為，由於新聞界需要大量迅速可靠的消息，在供不應求的時候，只好把傳說、臆測、謠言拿來充數。這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將永遠留在讀者記憶中。每天不知有多少這類輕率、淺薄與錯誤的消息出現報端，從來沒被更正。事實上，新聞界可以模擬輿論而誤導之。譬如說，恐怖分子被英雄化了，國防機密也被任意公開。在「任何人有權利知道任何事」的口號下，知名人物的私生活更被毫無保留的報

導。實際上，這是一個虛偽的口號，正反映出這個虛偽的時代。一個人同樣也有「不知」的權利——不受傳說、閒言、廢話疲勞轟炸的權利。這比「知」的權利更有價值，因為一個生活得有意義的人，並不需要這些多餘的消息。

索氏表示，輕率與淺薄是二十世紀的精神病，而以新聞界的症狀最為嚴重。談問題只知聳人聽聞，深入的分析難得一見。今天新聞界權力之大，已經超過立法、行政與司法機構。他們是被誰選任的呢？對誰負責？共產國家中的記者是公務員，西方記者的權力是誰給他們的呢？能享有多久？權力的限度如何？

在共產黨的控制下，鐵幕國家的新聞界只能發出同一種意見。習慣於這種永遠「舉國一致」的索恩尼辛，驚訝的發現西方新聞界也有走向某種共同偏好的趨勢。這種共同偏好是一種時尚。其中也許牽涉到共同的商業利益。在新聞自由的掩護下，合於時尚或合於新聞界本身看法的意見，自然受強調。不論如何，總的效果是：新聞界趨向統一，而非競爭。

知識界受制於時尚

西方社會的第六個病徵，是知識界為時尚所左右。

索氏指出，西方社會誠然沒有言論管制，可是時髦與不時髦的言論却被嚴格劃分開。知識界雖號稱百無禁忌，可是不時髦的言論却難以刊載於專著、期刊或講述於大專院校。在法律上，學者是自由的，

可是他們却受到時尚的無形控制。西方社會看不到鐵幕國家中赤裸裸的暴力，可是一個獨立思考的人却往往在時尚或大眾口味的壓力下，無法對社會作出貢獻。這種危險的趨勢，必將扼殺社會的健全發展。就因為不時髦的言論經常無法透過大眾傳播工具以獲得大多數人的注意，嚴重的無知與偏見自然形成。今天西方社會對世界局勢有一套自欺欺人的說法，這種說法在人們的心靈周圍築起一道厚牆，使來自東歐與東亞十七國的人們的呼聲無法穿透。總有一天，這道牆會被冷酷的事實撬開！

意志力的喪失

姑息投降心態，是索氏觀察到西方社會的第七個病徵。

索氏指出，如果西方國家不能克服意志力薄弱的弱點，再精良的武器也毫無用處。懦弱心態一日不除，精良武器適足以成爲投降者的累贅。西方即使採取守勢，也應該有犧牲的心理準備。可是在一個崇尚物質享受的社會，却完全沒有這種心理準備。能找到的只是讓步、拖延乃至於出賣的心理準備。於是乎，在可恥的貝爾格萊德會議中，西方外交官們就在這種怯懦心態下，從東歐人民用生命換來的戰線上退却了。

索氏警告說，西方的思潮已趨向於維持一個不計代價的苟安局面。這是一個社會衰亡的徵兆。除非瞎了眼，任何人都看得出來，海洋已不屬於西方，西方控制下的陸地也在日益縮小。下一次世界大戰，很可能永遠埋葬西方文明。索氏問道，對於一個具有光榮歷史又崇尚自由的西方社會，爲什麼在面臨文化滅絕的大危機的時候，抵抗的意志力竟然薄弱到這種程度？

對世局的隔膜與短視

這是西方社會第八個病徵。

索氏發現，儘管有充裕的情報，西方國家似乎並不了解世界的現實。（也許就是因爲情報過分充裕吧！）有些美國專家天真的預測，安哥拉會變成蘇聯在非洲的越南；也有專家認爲，美國對古巴的特殊禮遇，可以打消古巴出兵非洲的計畫。建議美國應該片面裁軍的喬治肯南（George Kennan）（按：美國前駐俄大使，蘇俄問題專家），就屬於這一類專家。索氏感慨系之的說，「你們真該看看克里姆林宮最資淺的官員如何嘲笑這種政治奇想！」

然而，索氏指出，最殘酷的錯誤，還是對越戰的無知。有些人熱切希望最好立刻停止所有的戰爭，另外一些人主張應該讓越南、高棉人民民族自決。我們現在看得很清楚，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終於促使美國出賣了越南與高棉，使三千萬人淪入鐵幕，面臨迫害與屠殺。索氏問道：今天，這些姑息主義者了解自己的責任了嗎？他們難道聽不到棉越人民的哀號？還是不願聽？在美國知識界失去道德勇氣的同时，危機已在迫近美國，可是却無人了解此點。美國的短視政客以爲簽定了草率的越南降約就能帶給美國喘息之機，殊不知百倍大的越南正當頭壓下。越南的教訓是一個警號，美國應該趁此機會激勵全國人民的道德勇氣。如果連全盛時期的美國都敗於半個共產小國，我們怎能期望西方國家抵擋赤禍？

索氏認為，西方民主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憑本身的力量即可擊敗希特勒；可是他們不此之圖，却把一個比希特勒更壞、更強，擁有更多資源，在西方有更多同路人的敵人——蘇聯——扶植壯大起來了。現在，居然又有一些西方人主張聯合「第三勢力」——中共——來抵抗蘇俄。索氏反對這種短視的主張。因為第一，這又是與魔鬼結盟，重蹈二次大戰的覆轍。其次，聯匪制俄雖然可以使美國暫時喘一口氣，中共總有一天會掉轉槍口，用美製武器來集體屠殺美國人，就像在高棉一樣。

西方的沒落

索氏觀察西方社會的初步結論，是它的日趨沒落。索氏問道，西方怎麼會從勇猛精進一變而成目前的病態百出？在西方社會的發展中，是否曾出現致命的轉變或迷失了大方向？似乎並不然。事實上，索氏認為，西方社會仍然以其驚人的科技成就朝向既定的目標前進。只不過突然間，它發現自己滿身是病。

索氏表示，這反映出問題是根本的，是出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的西方思潮。這是指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發皇，在啓蒙運動時代發展為政治思想，進而形成當前西方世界觀的思潮。由於中世紀專制教會過分壓迫人的肉體存在，偏重精神存在，那一段黑暗時代，乃在油盡燈枯之後結束。文藝復興帶來的轉變遂成為歷史必然。當時人們在拒絕上帝之後，轉而用過度的熱情追求物質層面的發展。這種新思想不承認人的內在罪惡，追求現世享樂被認為是最崇高的事。它把現代西方文明植基於人類物質需求這種危險的潮流上。除了肉體享受與物質需求之外，其他所有人類更高層次的需求，已不在國家社會注意範圍之內。好像人類已失去更崇高的意境一樣。這實在是通往罪惡之路。西方人自求解放的努力，最後終於以過度保障人權的方式實現了。也就在同時，西方人對上帝及對社會的責任却愈來愈淡薄。二十世紀以來，西方社會轟轟烈烈的科技成就，却補償不了它的道德貧乏。索氏感嘆：從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社會豐富了自身的經驗，却失去了協助人類控制盲動的上帝。

索氏認為，我們已失去最可珍愛的財產——精神層次的生活。在共產國家，它毀於專政的共產黨；在西方，它却被商業利益所窒息。這才是真正的危機。

社會主義的逆流——東西社會比較

索氏指出，在全世界都以西方成功的經濟發展作為楷模的時候，一些不滿現狀的西方人士却開始醉心於社會主義。他認為這是一個虛假而危險的潮流。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度過一生的他，斷然反對這種看法。

部分西方知識分子傾心於社會主義，自有其歷史與哲學上的原因。索氏指出，當文藝復興帶來的人文主義漸趨唯物的時候，人文主義本身就更容易被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所利用。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斯在一八四四年說：「共產主義就是移植的人文主義。」

索氏說，馬克斯的話不無道理。我們的確看到非精神化的人文主義與社會主義相近之處：濃重的唯

物色彩；免於宗教與宗教責任的自由（在鐵幕國家，這變成反宗教的專政）；以及透過表面上合於科學的過程所產生的社會結構的集中（這是典型的十八世紀啓蒙運動與典型的馬克斯主義）。今天西方與共產國家在思想上確有共通之處。奇怪嗎？這就是唯物論發展的邏輯。

索氏指出，沒有基督教傳統的人文主義，顯然不是社會主義的對手。因為後者更能前後一貫，自圓其說。在過去幾個世紀，特別是過去幾十年中，我們目睹了這個消長過程在全世界戲劇性的發展。自由主義不可避免的被激進主義所取代，激進主義又向社會主義投降，而社會主義從來就擋不住共產主義。今天共產黨政府之所以能生存發展，乃是因為有無數臭氣相投的西方知識分子一面熱心支持共產主義，一面故意對它的罪行視而不見。當他們不能再視若無睹的時候，他們就為這些罪行解釋開脫。事實上，在鐵幕國家中，共產主義已在意識型態上全面破產。它等於零，或小於零。可是西方知識分子却仍對共產主義一往情深。這正是為什麼西方國家難以抵擋共產國家的基本原因。

索氏特別提到著名的蘇聯數學家前蘇聯科學院院士沙伐瑞維區 (Shafarevich) 一九七六年在法國出版的書「社會主義」。根據沙氏的深刻分析，任何型態的社會主義都會導致人文精神的全面毀滅，而把人類帶入死亡。兩年來，無人對沙氏的論點提出反駁。

即使如此，索氏仍然不願把目前的西方社會，作為蘇聯或其他鐵幕國家的榜樣。索氏指出，鐵幕社會的苦痛，却磨練出一些具有堅忍、深邃等性格而不見於西方社會的人物。就精神提昇而論，鐵幕內的旺盛正與西方社會的衰竭成爲強烈對比。索氏坦白指出，在長期暴力統治與迫害之後，鐵幕人民期望的

是比目前西方電視無聊節目及不能忍受的音樂所構成的大家生活型態更崇高、更溫暖、更純淨的生活方式。西方式的生活已愈來愈不能作爲世界的榜樣了。

索氏認爲，歷史上，一個面臨腐敗衰亡的社會，通常會出現一些警兆，比如藝術之趨向頹廢墮落，或是偉大政治家的缺乏。有時會出現更明顯的徵兆。不久前，在美國政治與文化中心的紐約市，只不過幾小時的停電，就出現了成羣的市民在街上劫掠商店。美國社會的不穩定與不健康，實在令人駭異。

結語——人類生存之道

索氏沉痛的表示，如果我們不改變目前的生活，即使我們能逃過戰爭的毀滅也逃不過自我毀滅。我們必須重新界定人生與社會的意義。人是不是高於一切？在人之上是不是還有神？個人與社會應不應該被物質擴張所決定？如果這種物質擴張損害人的精神完整，我們應否容許它存在？

索氏指出，即使現在不是世界末日，也應是歷史的一個轉捩點，其重要性不下於歐洲之從中古黑暗時代進入文藝復興。我們必須在精神境界上力求提昇。力求高瞻遠矚。在這個嶄新的境界中，我們肉體存在既不致像在中世紀一樣的被咒詛，我們的精神存在也不會像現代一樣的被踐踏。這種提昇近似於進入人類學上的一個新階段。向上提昇，是人類唯一的出路。

三、哈佛聽衆的反應

六月八日當天下午兩點四十分，索忍尼辛在哈佛校長柏克的陪同下，走進露天的三百週年紀念會場（Tercentenary Theatre），近兩萬位應屆畢業生、校友、家長全部起立鼓掌。當索氏繼校友會報告及柏克校長演說之後步上講臺之際，全場再度起立鼓掌。演講進行中，聽眾鼓掌達二十餘次，使索氏不得不中斷數次。演講中兩度驟雨，也沒有減低聽眾的熱情。演講結束時，全體再度起立鼓掌，時間長達一分鐘。許多著名的聽眾擠向講臺，把索氏團團圍住，動彈不得。最後索氏決定再度就目前即將被判刑二十五年的蘇聯人權鬥士金斯柏（Aleksandr Ginzberg）（索氏過去在蘇聯的辯護律師）發表聲明呼籲大家支援。完事後，他在大家的熱烈掌聲中離去。

當然，哈佛聽眾對他個人的敬重與歡迎，並不必然代表他們同意他說的每一句話。當索氏激動的說「美國國內反戰運動最後終於使美國出賣了高棉與越南」的時候，全場如雷的掌聲中，也夾有噓聲。就筆者判斷，噓聲大概來自一九七八級（應屆畢業生）那一區。算算時間，反戰最激烈的一九六八年，這些大孩子才剛剛上七年級（初中），恐怕連越南在何方都不知道，可是美國年輕人總認為反戰運動是「屬於」他們的，不許別人批評。稍為成熟一點的人，看法就不同了，筆者所在的校友區，多是三、四十年代的哈佛畢業生，現在都是六十歲上下的年紀，他們對索氏所言，不時以點頭或低聲說「對」表示同意。當索氏為金斯柏作支援聲明的時候，鼓掌的人羣中也有一個少女手持標語牌，正面用俄文寫著「你不能用法西斯主義來反對史達林主義」，反面是英文「停止冷戰」（No more cold war）。不過她並未引起大家注意。

爲了進一步了解聽眾的反應，筆者在散場時訪問了三個人：一位應屆畢業的女生，一位壯年校友，一位一九二三級的老校友。

年輕的女學士說，她不同意索氏對反戰團體的批評，其他各點她沒有什麼意見，不過無法全部接受。壯年校友說，他是執業律師，因此完全贊同索氏對西方社會玩弄法律文字的批評；可是他認為索氏抨擊物質主義的態度有些過激，同時，他也不贊成索氏對社會主義的看法。白髮蒼蒼的老校友來自紐澤西州，是位化學師，他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正在唸中學，沒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趕上了，當時美國國內對於向日本宣戰意見分歧，羅斯福總統爲了達到參戰目的，只好故意讓日本偷襲珍珠港，造成同仇敵愾，來改變輿論；老校友感慨的說，索忍尼辛說得很對，美國人警覺不夠，「確實需要被喚醒」（Americans need be aroused）。

索氏對西方社會的評論也許過分率直與嚴厲，使美國人難以完全接受。從哈佛的學生報（The Harvard Crimson）到紐約時報，對索氏的看法都相當保留。事實上，索氏在演講之初，就已講明他「報憂不報喜」的諍友立場。會後有記者詢問索氏的助理艾白蒂，索氏的演講是否代表他對美國社會的看法？艾女士表示索氏在美生活頗爲愉快，這篇演說只提美國社會的黑暗面，是因爲有太多人在談光明面了。總結的說，這是一次極爲成功的演講。哈佛聽眾對索氏的論點，雖然很少人一句不易的接受，但是贊同大部分的要比反對的多。這固然是因爲索氏堅毅不屈的崇高人格使聽眾肅然起敬，更因爲索氏所論，皆能洞見癥結，切中時弊，而他娓娓道來，言辭懇摯，引起聽眾由衷的共鳴。

四、感想

五〇

從索忍尼辛對西方社會觀察的廣度與深度來看，證實了這位人權鬥士的隱居，並不是退縮與放棄。相反的，兩年的沉潛修養，冷靜觀察，似乎使他更肯定自身的使命感。坦白說，即使在開始反省和解放策的美國，索氏的演說仍然是不合時尚的。在蘇聯，他固然是孤軍奮鬥，現在在美國，他仍然是孤獨的。代表美國東部當權勢力(The Eastern Establishment)的紐約時報，甚至以他為破壞和解的危險人物。美國不但沒有放棄對蘇聯的和解政策，對另一個殘暴絕不亞於蘇聯的中共，却一再伸出友誼之手。索忍尼辛敢於在哈佛這種自命「前進」人士充斥的學府厲斥美國出賣棉越，西方國家出賣東歐，我們不能不佩服他這種「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

誠然，索氏對西方社會的評斷並不完全新穎。西方社會的玩弄法律文字，新聞界的濫權，個人自由的濫用，可說是西方社會的老毛病。關於美國人天真無知、短視膚淺的評語，也不是初次聽到。不過，索氏對其他病徵的觀察、分析，確有其獨到之處。

痛斥懦夫行爲

就以討論西方人勇氣與意志力的喪失來說，索氏毫不猶豫的把美國青年逃避越戰，斥為懦夫行爲。就算是比較不講究「面子」的美國人也不願被人以懦夫相稱，所以逃避兵役的青年，總有說不完的理由

，又是反對干涉他國內政，又是美軍暴行等等，說穿了就是「怕死」兩個字。筆者這幾年經常問美國青年一個問題：

「如果越戰還在繼續，而你被政府徵召赴越南作戰，你將如何反應？」

筆者同時給他們三條路選擇：

第一、應召入伍。

第二、拒絕召集令，準備入獄。

第三、拒絕召集令，逃亡國外。

選第一條路的人，大致是不怕死又守法的人。選第二條路的人，雖然怕死倒還知道守法。第三種人是既怕死又沒勇氣對自己的反戰行為負責的人。筆者的調查顯示，只有一、二位打算應召入伍，絕大多數人都選第二或第三條路。早幾年選第三條路的人較少，自從卡特總統大赦越戰逃兵之後，選擇逃亡的人數顯著增加。這個非正式的調查也許不一定準確，但多少反映出美國青年畏戰苟安的心態。這似乎已成爲他們的基本態度。如果沒有一個慘痛教訓，美國人是難以完全覺醒的。

批評知識界針針見血

索氏對美國知識界爲時尚左右的評語，可謂針針見血。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訪問中共，在美國造成中國熱。中國大陸被膚淺可笑的報導，美化成了一個「新大陸」。當時哥倫比亞大學講授中共刑事程序的

教授就曾在課堂上被學生挑戰說：「中國大陸哪裏有什麼犯罪？」這是爲什麼？高棉陷共之後，成百萬的百姓被恐怖屠殺了近两年，才漸漸受到西方社會注意，可是一本根據難民報導寫成的書 *Murder of a Gentle Land* (John Barron 與 Anthony Paul 合著，中譯本已由中國時報出版)，竟然在哈佛廣場找不到願意陳列的書店。相反的，親共學者如泰瑞爾 (Ross Terrill) 的一些大陸遊記，毫無學術價值可言，却經常被人提起。這又是爲什麼？只因爲在今天的美國，反共是不很時髦的，尤其是不很「前進」的問題是：時髦的，前進的，往往也是錯的。二次大戰前，英國首相張伯倫姑息希特勒的政策，在當時也是最時髦、最「前進」的。可是西方人一定要在血流成河、屍堆如山之後，才能了解自己的短視。

同爲海外反共愛國人士心聲

索氏引用二次大戰時盟國援蘇抗德、以致養癰遺患的歷史教訓來反對西方國家聯匪制俄的策略，可謂言人之所未能言。事實上，即使在這個政策的原始設計人季辛吉心目中，它最多也只能帶來一代的和平。可是冷酷的事實證明，和平未見蹤跡，而高棉、越南已淪入鐵幕；被集體屠殺的無辜人民，超過棉、越戰爭軍民死亡的總數，而目前戰爭仍在棉、越之間繼續，匪俄在幕後遙控。蘇聯仍在擴張，中共仍未放棄「世界革命」。人類如果不能接受歷史的教訓，歷史重演就難以避免。美國已走上張伯倫的舊路，也許只有美國子弟的鮮血才能澆醒短視政客의 迷夢。

這幾年來，我們目睹美國出賣盟友、討好宿敵種種親痛仇快的行動，心中實在有難以言宣的悲憤。

越南淪陷當天越共坦克轟然撞開越南獨立宮大門，長驅直入的電視鏡頭，仍然歷歷在目，而美國居然又在計畫用所謂「關係正常化」來出賣另一個盟友。是可忍，孰不可忍！索忍尼辛對西方的當頭棒喝，把我們反共愛國海外華人的心聲，向全哈佛，全美國，全世界痛快淋漓的發抒出來了！

索氏對西方社會抨擊雖然嚴厲，他並未忘記提出建設性的建議。他首先否定社會主義（按：用「極權社會主義」也許更妥當）成爲西方社會選項的可能性。然後他提出精神境界的重建與提昇，作爲匡正西方社會過分唯物的良藥。索氏充分了解過分偏重精神之害，所以他也反對回到文藝復興以前那種死氣沉沉的世界。文藝復興把「人」從「神」的桎梏中解放出來，重商主義與工業革命却把人沉溺在唯物的泥沼。不論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脫不了濃重的唯物氣息。西方人追求自我的再解放，必須奮力脫離唯物泥沼。這種突破，較之西方人第一次自中世紀教會的解放亦不多讓。索氏把他建議的境界描述爲「近似人類學上的新階段」，該不是誇張之詞。事實上，索氏的目標，是求取一個物質存在與精神存在能够平衡的人生與社會，一個新的、世界性的文藝復興。

與儒家思想有相通之處

作爲一個中國人，尤其是認同於民族文化的自由中國人，我們不能不訝異，索氏的論點與儒家思想有衆多相通之處。道德勇氣與意志力的重建，正是「養浩然之氣」的功夫。特立獨行不隨俗浮沉正是「狂狷」之士本色。最重要的，還是索氏主張精神物質的平衡，以矯正西方社會自文藝復興以來的唯物偏

差，正暗合強調「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中庸之道。從這個角度看，儒家思想對匡正西方社會的時弊，亦有可適用之處。這似乎也證明了十一年來，國內文化復興運動並不是抱殘守缺的復古，而是具有嶄新的時代意義的！

聽完索忍尼辛的演講，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兩場驟雨把我淋得渾身濕透，在傍晚的涼風中，我絲毫不覺冷，反而在心頭有說不出的暖意。索忍尼辛不但是一位鏗而不捨的反共鬥士，更是一位悲天憫人的文化先鋒。最令我們欣慰的發現，是索氏三四十年的反共奮鬥，在一個遙遠陌生的世界中獲得了與我們完全一致的結論。「德不孤，必有鄰」，古人誠不我欺！

六十七年六月十五日於哈佛

後記

這是我參加哈佛畢業典禮，親聆索忍尼辛演講的追記。關於講詞內容，除了當天我的筆記外，主要是參考八日哈佛校刊 Harvard University Gazette 刊載的講詞全文，以及其他學生報、波士頓各報、紐約時報的報導。爲了存真，我儘可能用索氏原句。索氏原文未分段編號，爲了便利閱讀，我稍加整理，分了段也編了號。

脫稿當天（六月十四日），收到十、十一兩天的中央日報航空版。當我讀到十一日社論中「我們要含着熱淚向索忍尼辛先生致敬最崇高的敬意」的句子，不禁再度熱淚盈眶，因爲這正是我當天的寫照。回想當時，我在雨中含著熱淚爲索氏痛斥美國出賣盟友而鼓痛了手掌。對於自己能參與這歷史性的一刻，感到無比的榮幸。

順便在此建議我們的文藝界在明年「五四」文藝節邀請索忍尼辛訪華。我深信索氏會發現，中華民國比他的第一故鄉（蘇俄）與第二故鄉（美國）都更爲溫暖。（原載六十七年六月廿四、廿五、廿六日中央日報）

索忍尼辛忠告西方國家：

五六

須以道德勇氣作爲對付共黨的有效武器

· 關 中 ·

自從英國國家廣播公司訪問了索忍尼辛之後，兩年多的時間中，索氏均很少公開活動，他埋首寫作，每天幾長達十三小時。今年六月八日，索氏接受了美國哈佛大學所給予他的榮譽博士學位並發表了一篇精闢的演說，在這一演說中，索氏不但尖銳地批評了西方的弱點，並且正告美國政府，「聯匪制俄」只能給美國帶來災難。綜合索氏在哈佛大學的演說內容，可歸納爲下列三點：

一、對西方社會忽視道德與缺乏勇氣的感嘆。索氏認爲人類有一種約束自己感情的崇高本質，但在西方這種本質已逐漸消逝。西方社會本爲人類的模範，但由於過份重視物質生活，玩弄法律及大眾傳播之不負責任，使西方的生活方式已不再是值得追求的目標。索氏指出今日西方社會的一個奇怪的現象乃是任何人均有做壞事的自由。相反地，真正有抱負，想要對國家從事建設性工作的人却處處受到阻撓。他認爲這不但是一種「不平等」，而且是極其「不道德」的現象，索氏警告說：共黨邪惡勢力業已向西方採取了無定性的攻擊，我們已充份感受這種壓力，爲什麼你們的螢光幕上與出版品中却充滿了酒色追

逐呢？你們究竟爲了什麼而喜悅呢？

這種西方「精神空虛」最大的特色便是「勇氣的衰退」。爲了保衛自己，任何人都要準備犧牲，但在一個崇拜物質享受的社會中，這種準備犧牲的勇氣是無法培養的。

索氏認爲除非西方能克服這種道德與勇氣的危機，否則任何科技進步與物質繁榮都不能挽救西方的失敗，他認爲對付共黨的挑戰，道德與勇氣是最有效的武器。

西方所謂自由主義者藉反戰而甘作共黨幫兇

二、對西方盲目和平主義者的譴責。索氏指出西方一些所謂自由主義者，一提到「反共」便認爲是過時與落伍的思想。這些人士自視清高，往往以人道，和平等作幌子對共黨姑息，但事實上却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幫助共黨，埋葬西方，扼殺自由，這些號稱自由主義者對西方世界的種種缺點，爲了表示「罪惡感」，故經常對共黨世界抱持好感與縱容的態度。對極權制度下的「效率」，「平等」等讚不絕口，但却絕口不談人民自由之全然被剝奪的事實。總之，他們對共黨的任何罪行，避之惟恐不及，相反地，却不惜昧着良心，以雙重標準來掩飾事實，曲解歷史。

索氏在哈佛大學的演說中，面對當年反戰的大本營，沉痛的指出美國反戰份子努力的結果，造成遠東國家之被出賣，並導致中南半島三千萬人民淪於被大規模屠殺的命運。索氏憤怒地問到：這些以和平爲名的反戰份子是否聽到由中南半島傳來的呻吟？他們是否瞭解他們應對此一悲劇負責？抑或是他們只

是充耳不聞，無動於衷？

五八

索氏告訴將近兩萬名聽眾說：「你們那些簽訂越南投降條約的短視政客，似乎給了美國一個短暫的喘息的時刻。但是目前却有千百個越南危機正在逼近美國。」索氏認為越南事件對美國應是個警告，美國應藉此一機會，重新振作起來。否則如美國讓世人接受美國已被北越擊敗的事實，美國又如何領導自由世界來面對蘇俄與共匪對西方更大的挑戰。

「聯匪制俄」將導致美國最後同被埋葬

三、對美國幻想「聯匪制俄」的警告。索氏一向反對美國對共黨政權進行安撫。此次在哈佛大學的演說中，更特別警告美國切勿與共匪建立關係，索氏指出任何與共匪的合作均是一種「與邪惡勢力的聯盟」不但註定要失敗，而且會導致一次「埋葬西方文明」的世界大戰。索氏說美國政府或許認為與共匪改善關係是一個機會，可以暫時緩和共匪的歧見，但他強調，共匪終將與美國反目，甚至以美國的武器來對付美國。到了那一時候，美國將會成爲自己政策的犧牲品，一如今日的高棉遭受大規模的屠殺。

美國態度軟弱直接鼓勵了共黨對外擴張

值得我們注意的，索氏在哈佛大學的講演剛好在美國總統卡特在美國海軍官校發表對蘇俄強硬情況的第二日。卡特在頭一日指責了蘇俄的對外擴張政策，但索氏在第二日却指出，蘇俄擴張的原因並非是蘇俄的強大，而是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軟弱，索氏之言，使我們不禁感慨，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空言無補。

於實際，美國今日需要的乃是以具體的行動來對抗共黨的擴張，以堅定的立場來維護自由世界的利益，以道德的勇氣來謀求世界真正的和平、安定與繁榮。

引起美國各界人士關切的

索忍尼辛哈佛演講詞

六〇

中央日報分三天刊出了王紹陵先生追記索忍尼辛的講演「勇者的證言」。作為索忍尼辛批評的主要對象——美國，對索氏的演說有何反應？近日新聞電訊中已經有所報導；六月二十六日這期的「時代」周刊請了八位美國知識界的精英發表意見，標題就是「索忍尼辛對嗎？」(Is Solzhenitsyn Right?) 中央日報亦予全文譯出，八人的先後次序，均依其原文。

——編者

相隔三十一年哈佛兩篇演說

自從國務卿馬歇爾發表「拯救歐洲的廢墟」計畫以來，還沒有一位畢業典禮的演說者能像蘇俄流亡作家索忍尼辛那樣激起人們的注意。這兩篇演說都是在哈佛大學的校園發表。哈佛有時似可象徵西方追根究底和人文主義的精神。這兩篇演說在時間上相隔卅一年——從哲學的層面看，兩者更被無法度量的深淵所分隔。馬歇爾於一九四七年呼籲世界上最能代表民主政治的美國，將其資源和能源用來解救飽經戰亂、危機四伏的歐洲大陸。而索忍尼辛則在一九七八年痛責美國，指其導引西方的衰落。

這位目前居住在維蒙特州迦文笛詩小鎮附近的諾貝爾小說獎得主抨擊美國的民主政治。依他的觀點，美式民主的規約保障的只是「平庸者成功」。他譴責美國「勇氣的淪喪」，而「在統治階層和知識界精英當中」尤為顯著——這點必定令他的聽眾覺得刺耳。他還嚴苛地批評美國：沉醉在「習慣性的極度安全和幸福中」，執拗於法律條文，致使國家「抵禦邪惡的侵蝕」的能力陷於癱瘓以及西方新聞界的專事報導「傳言，荒誕不經的說法」。

在東方（按：指蘇俄），他說，人們「正日趨堅定及強壯」，而西方人們却受到「今日的羣衆化生活習慣……令人憤怒的宣傳攻勢，使人麻木的電視和難以忍受的音樂」所腐蝕。

他指出：「沒有任何武器：能夠助長西方，除非它克服本身已喪失的意志力：要自衛，人必須也要準備犧牲生命；而在一個崇尚物質享受的社會裏就缺乏這種準備。」所有這些問題的癥結，根據他的看法，根植於文藝復興與啓蒙運動的「理性主義的人道主義」，它使得「我們背棄精神而過度的崇尚物質」。他並說，這種物質主義的發展迫使我们無可避免的從自由主義走向激進主義、社會主義，最後到共產主義。索氏認為，即使我們能倖免戰禍，也無法逃避另一種大禍——「一種精神的喪失和缺少宗教的人性。」

索忍尼辛對西方民主政治，特別是對美國的抨擊究竟是否正確呢？時代周刊請了八位美國人——都是屬於他所指責的「領導階層和知識界精英」，來做一番回應。

索氏批評重心在於世俗主義

■查爾士·福蘭克蘭 Charles Frankel（詹森總統任內的助理國務卿，他是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和公共事務教授，且是北卡洛萊納州「全國人道中心」的領袖。）

索忍尼辛所看到的西方是讓人可隨意看的，它既華而不實，且帶來不祥：狂求的享樂主義；強調個人權利而並未相對的強調個人紀律或社會責任；知識文化被私慾濫用並導入幻想。索氏批評西方「民衆勇氣」的喪失，他是對的，如果他指的是知識和道德的淪喪，失去了對使我們達成特殊成就的思想和行為習慣負責之信心——包括知識分子的素養和建立客觀及公共精神可能性的信念，尊重才能以及珍貴的自由所換取的單純享受。

但顯然的索忍尼辛腦筋裏想的不是這些。他批評西方的重心是在它背離宗教的世俗主義。中古世紀所代表的是「無法容忍的對個人肉體的專橫壓迫。」爲了報復，我們在西方的人「背棄精神而過度的崇尚物質。」我不認爲過去是這樣，對現在和未來看法也不同。

文藝復興、現代科學、冒險的時代以及資本家企業都是爲反抗中古世紀時代對精神和智慧的壓迫。由於中古世紀教會機構的腐化、教廷的遷就世俗、僧侶的貪污以及牧師的崇尚物質而導致了基督教和天

主教的改革。要了解超凡的觀察家及預言家，如索忍尼辛，就必須了解這些歷史背景。索忍尼辛心目中看到的不僅是我們大多數人應該信奉宗教，而且要實行神權政治。

索忍尼辛提醒我們的是對的，我們與蘇俄制度的分立，原因不僅是政治的衝突，而更是對道德觀念的看法不同。但是一個大國，能採行並長期實施一個永遠不向魔鬼妥協的政策，但只能透過耗盡其本身力氣，使年輕一代戰死，使倖存者麻木和把野蠻行爲發揮到極限的方式才能完成大業。索忍尼辛一生的經歷與地獄相差無幾。他的想法是出自一種對天堂的幻象。可以預料的是，當他轉身走向我們這個仍在半途的世界時，他看到的只是火般的紅與耀眼的白兩種顏色，而介於這兩種之間的其他顏色，對他來說似乎都是虛幻之象。

真理千古不朽值得深思冥想

■西爾都·赫斯柏 Theodore Hesburgh（自一九五二年以來一直爲聖母院大學校長；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二年間，他出任美國民權委員會的主席。）

索忍尼辛說，我們在西方的人被大眾傳播所灌輸的只是一些流行與時尚的事物。他接著給予我們一些不合時尚和不流行的真理：「這裏有一種道德淪喪的氣氛……只有道德的標準可以幫助西方對抗共黨計畫週詳的世界戰略……我們對於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期望太多，最後只有發現我們最珍貴的財產——我們的精神生活之被剝奪。」

這些重視精神的講題是千古不變的，它使我們憶起杜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伯德亞也夫、巴斯納克等人。它不能構成頭條新聞，但却是值得深思冥想的題目，如果想要逃避道德淪喪的時代。對我們最佳遺產的這項提醒，我們非常感激這位新來的陌生的鄰居，他有些與世隔離，透過（討厭的）電視了解我們，但却能及時和在永恆中，與我們共同追求較佳生活的最深期望。

放逐者的心情需多接觸現實

■阿奇勃徹·麥克萊希 Archibald Macleish（傑出的教育家，曾得普立茲詩與劇作獎，他於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四年任國會圖書館長，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曾為助理國務卿。）

自從湯瑪斯·潘恩以來，在針對美國國家目標的長期而廣泛的爭辯中，美國人曾獲得許多來自國外朋友的建議與忠告，美國的革命是否正如傑佛遜畢生所信仰的，是「喚醒人們掙脫枷鎖的一項訊息」，還是就像約翰·亞當斯所認為的只是一次「爭獨立的戰爭」？顯然潘恩是站在傑佛遜一邊的。是否又如韋伯斯特所認為，在南北戰爭前，我們奮鬥的目標只是保衛「聯邦」，還是林肯總統在蓋提斯堡演說中所揭櫫的（民有、民享、民治）國家，好幾十位英國作家告訴我們如何探討這問題。如今，我們已成為世界強國，自由世界的領袖，並正與近代史上最霸道及高壓的警察國家對峙，但上述這些爭論、忠告與建議仍然未止。

我們是否要對美國革命所導發的全人類革命應負責任呢？索忍尼辛在六月驟雨中，在哈佛大學校旗下的畢業典禮中，與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索忍尼辛是當代最受人景仰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優秀小說家，因而是一位訓練有素，對人類生活的現實的敏銳觀察者；他有高尚的情操和無可匹敵的勇氣，為信念而幾乎殉道的精神使他成爲一個真正的勇者。但是不像其他早期對美國進言的人，索氏對美國生活及美國人所知有限。他真正關心的還是他那正在苦痛中的祖國；他是一個被警察國家放逐的人，也是一個追尋人性精神的遊子。

所以他是以前一個被放逐者的心情來評斷美國。他問我們：是否真的準備反對統治蘇俄及整個東歐的（共黨）暴政？我們是否準備在這場鬥爭中犧牲自己？我們有沒有勇氣？是否由於富足以及因脫離宗教而對人性精神漠不關心，以致使我們這一代變得軟弱而不敢起而戰鬥？儘管他的人是生活在維蒙特的小鎮，在哈佛問這些問題，他的心並不是真正的在此地發問。他看到的美國人很少，他只能說少許英語，他對這個國家的觀察，不是靠人與人間的直接接觸，而只是透過電視節目。電視節目提供給他的是美國生活中拙劣的一面，不同的是，我們了解其拙劣，而索氏却不知。

假如索氏能與他在維蒙特州小鎮的鄰居談一談，與他的同業作家們談一談，與一般人談談，他所譴責我們的過失就不會成爲過失了，他說我們沒有責任感，我們只把自由放在第一位，責任放在其次。如果他能與我們談談，他會體會到因爲我們是自由人，我們才會把自由放在責任之前——因爲自由人是自治的，因爲他的責任必由他自己決定，因爲除此以外，別無其他人可以爲我們做決定——國家警察不能，宗教也不能，任何人都不能。

假如他能與我們談談，或者他曾經與我們談過，他會知道我們不是不負責任，我們常常嚴肅的、甚至經常是痛苦的在建立我們自己的責任。

索忍尼辛在哈佛所談的國家意志，也是一樣。他說，我們失去了國家意志；好像他曾問過我們，而真正了解我們的想法一樣。但實際上他並未問過我們，也不了解我們的想法。近四十年前，二次世界大戰曾迫使我們面對一項足以使我們分裂的問題，如果我們是不自由的，便無法能如此順利的顧及自己及彼此的願望。我們解決了那個問題，我們一致決議做應該做的事，而且我們的確做了。我們達到了有史以來的頂端；我們迄今並無改變，我們不僅這一代不變，世世代代也將不會變。

假如索忍尼辛曾與我們談過——與少數維蒙特州小鎮的鄰居——或三四位尊敬他的美國人談過，那麼他將不會在哈佛發表那些話。他將了解我們有自知之明，並且也有具體的理想。他也將知道我們並沒有喪失民族的意志，使我們真正信仰人性精神——正如他想告訴我們的——正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意志。

認為索氏獨斷懸義未免過高

■丹尼爾·布爾斯汀 Daniel J. Boorstin (現任國會圖書館長，他的著述「美國人」及最近所著「科技的共和國」，曾獲普立茲獎。)

我們很幸運有能力提供索忍尼辛一個講壇來發表他那篇針對我們的評論。蕭伯納曾公開他那蔑視美國人却用使美國人喜歡他嘲諷的秘密。即爲了喚起他們熱切的興趣，特別的考慮及不朽的奉獻決心，最

有效的辦法就是把他們單挑出來，成爲宇宙嘲諷的對象。」

淺薄的社會學家總是述說他們自己的問題，而絕少能析論我們的問題。由於索忍尼辛的生命是由難得的殊榮和迫害的教條的不快樂所形成的，可以理解的是他很容易過分高估這些武器。而他也變成了自成一格的一種嚴格的獨斷論者。他帶來的是那種咒詛舊世界的救世運動，他尋求團結、美德、道德、統一、尊嚴——特別是「拒知的權利」。但這些與我們複合性的道德觀——妥協、正直、自我懷疑與實驗——無甚關聯；這是一項迂迴的追尋，它使得美國社會重新來過的機會可望而不可及。

索忍尼辛個人的經驗促使他希望用好的極權主義來治療那個不能容他的壞的極權主義，禁止新聞記者「不實」的報導，使「色情、犯罪、恐怖」不再出現於電視，同時爲了保護消費者去抵制自由市場。但怎麼做呢？

不論他會告訴我們任何有關他自己的事，却很少有關我們。他根本就沒有說到正題。這個由移民組成的國家證實了一項可能性，即人們不必依賴共同性，而可以基於彼此間的差異，齊集在一起，並鞏固他們的社會。我們的勇氣是來自許多傑佛遜、許多林肯和其他人的遺產，它不是索忍尼辛所倡導的那種眞信仰者的勇氣，而是懷疑的勇氣。

爭取人權自由最有力的呼聲

■喬治·閔尼 George Meany (自從一九五五年來一直擔任勞工聯盟主席。一九七四年索忍尼辛

被蘇俄放逐後，閔尼是第一位邀請他演講的美國重要組織負責人。）

我很驕傲因為勞工聯盟曾是第一個安排重要的場合讓索忍尼辛面對美國人民發表他的演說。我們已忘記索忍尼辛當時如何震撼那些沒有骨氣者的心智，那時他們正陷入由越戰後的罪惡感和時髦的泛泛主義兩者所混合的不健康情緒，這種情緒不僅發自左派人士，且來自不顧死活的想與蘇俄從事貿易的美國商人。

我並不同意索忍尼辛所講的每一件事，但我要敦促沒有骨氣的人們提高警覺。索氏的預言顯然比那些人昨天反共的陳腔濫調要正確得多。反對越戰的人也許不喜歡聽到他所講的「美國反戰分子的反戰運動使美國背叛了遠東國家，造成集體屠殺和三千萬人今天受苦受難。」某些新聞界人士也不願聽到這些問題：「一個新聞記者究竟負些什麼責任？如果他以不實報導或錯誤的結論導使公共輿論或政府誤入歧途，他們是否認錯並出面更正呢？」不管你喜不喜歡，索忍尼辛是對的。

我也同意索氏叱責西方國家正面臨勇氣的淪喪。但我不認為這種勇氣的淪喪已達到索氏所說的那樣深遠和那麼普遍；但無疑的，近幾年來美國的政策，對於世界極權主義者，有過分妥協的傾向。

沒有一個來自古拉格羣島，受到強烈道德壓迫感的人會認為西方能產生適切的道德的感性和回應。不過我並不認為我們的精神已經枯竭，或這種枯竭可歸咎於我們物質的進步。勞工對這種進步的貢獻很大而且是不可或缺的；我也無法苟同物質和精神的提昇無法並行不悖的說法。

最後，我同意索忍尼辛所說，東方不應視西方為其楷模。但今天的世界政治與這個問題無涉。問題

是今天在蘇俄，中國大陸、古巴或其他極權國家的人民是否能有權決定他們所希望的生活模式。基本上來講，這是個人權問題，也是自由問題。在爭取這些權利的鬥爭中，沒有一種聲音能比索忍尼辛的更有力或更有效。

並非要求戰爭而是保衛自由

■西迪尼·胡克 Sidney Hook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戰爭、革命與和平學院高級研究員，同時是紐約大學榮譽教授。)

我完全同意索忍尼辛在哈佛演說所談論的道德與政治的價值觀。我也同意他對某些政治問題的判斷。我不同意他的，主要是在哲學思想方面。對於自由和人造社會的追求及維護，並不需要接受宗教信仰、形而上學或神學的圭臬。道德在邏輯上是與宗教無關而獨立的。實際上，自由的社會崇尚宗教自由，但它所涵蓋的不僅是信仰的自由，而且有不信仰的自由。

索忍尼辛的論點屬於杜斯妥耶夫斯基的傳統；後者認為假如人要是信上帝，則必信奉魔鬼或像凱撒一樣只信仰自己。對於民主政治所崇尚的複性信仰來說，這種（只有三種選擇）論點太曖昧。古代許多有組織的宗教曾支持專制政體，即使今天，仍有一些教會人士是這樣。

在政治生活中，自由與自由有時是衝突的，如「知」的權利可能與「隱私」的權利衝突。我同意索忍尼辛，因為除了知識自由外，我們不能把「善」與一般的「自由」視為絕對。索氏呼籲西方加強的是

責任而非權利，我們最崇高的責任必須是「追求明智的道德責任」。

索忍尼辛被誤解他的人指控說，他是在要求西方發動一項對共產主義的聖戰。事實上，他只呼籲保衛自由的決心，達成一個光榮的和平。我們現在應已了解。不顧代價的和平必導致對暴力侵略的卑屈投降。索忍尼辛的論點，在本質上，與約翰·甘迺迪以及邱吉爾等對自由的主張並無不同。

索忍尼辛對學術道德標準的指責是對的。從我們對高棉種族被屠殺及古巴、越南人民被壓迫的充耳不聞，而對南韓及南非如雷的喧囂可以比較出來，索氏批評我們勇氣的衰落是對的。他說把生存視為生命及一切目的，必將導致其社會喪失一切生活的價值。他警告我們：當自由受到威脅時，誰要是把個人舒適、私產及安全看得比自由更重要，他們不僅將喪失自由，並且連帶失去舒適、私產及安全。這項信息值得我們全心接受。

安於目前情況比極權主義好

■傑茲·柯辛斯基 Jerzy Kosinski (波裔小說家，一九六五年成爲美國公民，曾在一九六九年以「脚步」一書獲小說獎，同時也是「塗色鳥」一書作者。)

我是出生於歐洲法西斯主義下的孩童，是希特勒大屠殺下的生還者，史達林精神古拉格島的一名研究生，在這個國家(美國)享受了廿年自由後，我是否會準備拒斥這些自由，就因索忍尼辛所說「個人權利的過分擴張，使得社會對某些個人完全失去防衛能力」？有一半時間在極權專制政治下度過的我，

是否會因爲索忍尼辛遺憾「一個政治家若要在這國家獲得重大成就或高度作爲，必須隨時小心翼翼甚至變得懦弱」就會感到我個人的自由正陷入危機當中呢？我成長於東歐道德淪喪的時代，是否會因索氏所說「今日的羣衆生活習慣」，而對人類心靈危機產生恐慌？在這裏，我不能主宰我自己的靈魂嗎？

和索氏一樣，我對數以百萬計的人在極權政治下被殺害感到悲哀(包括我的一度是人口衆多而今僅存三人的家庭)，然而我相信他未能了解，在舊專制被推翻後與新專制將建立前，在這段空檔時期中，民主政治至少是最佳的過渡制度。即使自由、容忍或其他品質也許是民主政治下的缺點，它總比極權主義下，嚴酷的要求糾正，要好的多。正像對一個作家的作品，自由只能存在於它能不斷地被解釋——甚至對它的誤解。

索氏是位先知批評有助深思

■芭芭拉·特區曼 Barbara Tuchman (歷史家和作家，曾以「八月的槍砲」「史迪威與美國人在中國的經驗」等書，獲得普立茲獎。)

索忍尼辛是「以賽亞」一類的先知者，當人類犯了嚴重錯失時，他起來痛斥時代及其罪惡。人常常歡迎被責罵，特別是當他們良心不安時——就像在這可怕的廿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一樣。這點可以解釋索忍尼辛的時尚。他是合乎時尚的，他是我們當代(爲改革宗教而殉道)的薩佛納羅拉。我不認爲他對有關西方社會的說法都是對的，雖然聽他嚴厲的批評也是有所助益；這些話可讓我們深思。然而，我認

爲美國擁有良好的品質的傳統，也許只是現在尚未到達應有的水準；但我寧可住在美國而不選擇任何其他地方——我想索忍尼辛一定也是這樣。（梁嘉木譯）（原載六十七年六月廿七日中央日報）

中華民國學者和宗教領袖

對索忍尼辛哈佛演講詞的感想

索忍尼辛在哈佛大學發表的演說，在美國曾引起不同的反應，亦爲我國各方所注意。中央日報記者特別訪問了幾位教授學人和宗教領袖，談談他們對這篇演說的感想。

——編者

振聾啓聵之論堪稱人類之言

■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吳經熊博士昨天指出，索忍尼辛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的演講，對於物質生活日益腐化、道德勇氣日漸淪喪的西方民主社會，具有振聾啓聵的作用。因此他認爲自由世界應切實記取索忍尼辛的逆耳忠言，重新團結振作起來，消滅共產暴政，爲自己、爲人類開創光明的前途。

吳經熊教授說，索忍尼辛這篇真知灼見的演說，不僅代表他個人的心聲，同時堪稱爲「人類之言」。

吳教授認爲，索忍尼辛曾經在蘇俄統治下，度過漫長的歲月，並飽受共產暴政的迫害，因此他對鐵幕內戕害人性、抹殺人權的情形，知道的最詳細，瞭解的也最深刻；另一方面，他自從被蘇俄政府放逐

後，便流亡至西方民主國家中，多年來對於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文化與道德，也有了深刻的體認。

他強調：在索忍尼辛的演講中，所道出西方民主社會最大的缺失，在於人民濫用自由，過分強調法律的文字，因此使他們失去防止腐蝕的能力，最後終會給予共產主義可乘之機，索氏這一理論最爲精闢，而且西方國家應以此爲警惕。

此外索忍尼辛認爲：西方國家由於道德勇氣的淪喪，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同時更給那些短視的政客帶來更大的危機。

吳教授認爲，索忍尼辛語重心長，正是對美國的暮鼓晨鐘，如美國目前所採的「聯匪制俄」政策，對共匪迫害大陸八億人民的人權，却視若無睹，這就是道德淪喪的最具體表現。因此，吳經熊教授提醒美國及西方國家，應仔細並冷靜地體會索忍尼辛的針砭議論，進而有所覺醒，堅定反共信心，努力爲反共大業而貢獻力量。

慢慢冷靜下來必有深遠影響

■中央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朱炎說，索忍尼辛的言論，已在美國社會中掀起一股震撼的力量，並引起了不同的反應。

朱炎教授認爲，許多美國人在乍聽到他的論調後，起初是驚訝，接著便產生直覺的「排斥心理」，

特別是許多標榜「自由派」的人士，他們指責索氏「不瞭解美國的民主方式」，或批評他的評論過於悲觀。

但是真正分析他們反駁索氏的言詞，朱教授認爲他們多係避重就輕，而沒有抓住重點，來澈底加以辯解。

對美國文學、歷史有深入研究的朱炎指出，美國人不願面對現實，是他們的通病。可是在一逞口舌之快後，他們還是會漸漸接受別人批評，逐步改進，特別是美國文學界，對索氏之言一定會引起熱烈的討論與迴響。

他舉例說明，在越戰結束後，美國受到多方的批評，認爲他們在物質追求下，喪失了道德的勇氣，表面上美國人雖不肯承認，可是在文學界，確有不少的反應，他們寫作的內容，漸漸走上發揚人性，重整道德的道路。

因此，朱炎說，現在索氏言論甫公諸於世，美國人還不願接受，但是等高潮過去，美國人仍會冷靜來分析他的忠言，默默地從迷失中，找回真正的自我。

索忍尼辛目前也許會受到美國輿論界部分的排斥，但朱炎教授却對索忍尼辛的勇氣與熱忱，表示無限的欽佩。

他說：「索忍尼辛此次登高一呼，就如同中古世紀的唐吉訶德一樣，面對惡劣的勢力，毫不畏懼屈服，而希望以個人微小的力量，來喚起世人的注意，共同努力，攜手剷除西方社會中腐化、惡劣的力量

。所以不論他最後能否成功，他的這種熱忱與勇氣，是值得敬佩的。」

一語道破時弊增強免疫力量

■天主教臺北教區總主教羅光及毛振翔神父說，索忍尼辛的演說一語道破了今日西方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社會的癥結所在，那就是物質生活過度發達，而忽略了精神生活的層面，因而使美國面臨了極大的困擾。

這兩位天主教人士一致指出，西方社會和中國一樣，自古以來，即物質與精神保持平衡，因此使得人類的道德文化，能够保持不墜，並得引發人性的光輝。

但是自從二十世紀以來，西方由於科學、技術的急速發展，使得物質超越了精神，於是道德文化在西方逐漸沒落，特別是足以維繫西方道德社會的宗教力量，更是漸漸式微了，而使精神生活被排除在物質社會之外。

索氏推斷西方道德淪喪後，將走上自由主義、激進主義，隨之成為社會主義，最後走上共產主義之路。但是羅光認為他這種推論過於武斷。羅總主教指出：西方民主社會一味追求物質生活，將促成自由主義，於是在濫用自由情形下，最後反而會自食苦果，會成為集權主義，但並非一定會造成共產主義。

毛神父說，透過索忍尼辛的獻言，將會給美國帶來一股新生力量。他一再強調，美國社會就好像人體一般，並非免疫，而只是在病菌侵入後，一經發現便會產生抗體。而索忍尼辛的諍言，對於得了「腐

化症」的美國，正如同抗體一樣，必漸漸受到重視，而能對症下藥，使這些問題迎刃而解。

羅光及毛振翔認為，索忍尼辛的這一番話語，足以提醒西方及美國人民：如何恢復西方輝煌的傳統道德文化，將是他們自救的唯一途徑。

勿步西方後塵我亦應知警惕

■「索忍尼辛的演說中所提到的西方國家忽略精神重視物質，將會造成嚴重的後果，他這一高見，不僅是切中民主社會的時弊，同時對我們目前社會狀況，也有深遠的警惕作用，因此我們應記取西方國家的教訓，針對社會的缺失，來痛下針砭，改過向善。」臺大外文系教授朱立民，在讀了索忍尼辛在哈佛大學的演說文後，作了上述的表示。

朱立民說：「我完全同意索忍尼辛所談論的道德及政治的價值判斷。」

可是朱教授認為，像索氏的言論，在美國未必能够使人人都接受，例如美國「時代」週刊報導，一些美國學者就指責他的言論，與事實不符，且有懸義過高之嫌。

朱立民指出：「忠言逆耳，良藥苦口」，因此像索氏對西方社會所作的嚴厲批評，對樂觀的美國人而言，當然會有人聽不進去。可是就比例上來說，贊成索氏言論的佔六成，反對的人只有四成，這已證明了索氏的言論還是會產生一些影響作用。

從另一方面來說，朱教授認為索氏的金玉良言，對我們國家也有相當程度的警惕作用，他說，目前

我們的社會，雖然沒有到達墮落的程度，但是面對物質建設日益發達的社會型態，國人有必要提高警覺，避免步上美國等社會的後塵。

他說，我們對於索忍尼辛的演說，應加以深思，如果我們社會中，也有類似他所提出的西方社會缺陷，那麼我們便不應諱疾忌醫，而要對症下藥，尋找根源，加以改革。

真理越辯越明世人終必信服

■臺大歷史系教授張忠棟認為，索忍尼辛在哈佛校園的演說，正是對於西方社會「愛之深、責之切」的具體表現。

張忠棟說，索忍尼辛身為知識分子，在共產社會裏，曾歷經無數迫害，使他對共產暴政澈底的絕望，因而希望澈底推翻共產政權的念頭，便從他的心中油然而生。

隨後他離開了蘇俄，懷著無限的憧憬，來到西方社會，渴望藉著西方民主的力量，結合起來，打倒共產暴政。因此從基本心理上分析，張教授認為索忍尼辛對西方民主社會是「愛之深、希望更深。」

可是當他親身經歷西方民主社會後，對於過去的憧憬幻滅了。因為在民主國家，特別是美國，社會散漫，沒有規律，因此他認為，以如此鬆懈的組織型態，不足以對抗控制嚴密的共產社會的，所以索忍尼辛才會有在哈佛大學演說這種「憤世嫉俗」的言論，以發洩他內心的失望與不滿。

張忠棟說，索氏對西方社會，最大的批評是他們物質生活超過一切，而忽略了精神生活，而一些美

國學者，却指責他是以一種放逐者的心情，來做惡意攻擊。

張教授認為，索氏的西方社會物質過度發達論點，在某一方面是正确的，可是另一方面，與事實有一些出入。

他指出，美國從二十世紀以來，物質便是飛躍發展，因此在美國社會中，已有一種「反物質文明」的力量，在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時，慢慢滋長，這股力量，尤其以年輕人佔大多數，他們對物質生活感到厭倦，而希望歸返自然，追求人性真理。

因此索忍尼辛在哈佛大學的演說，當時在校園內，獲得大學生數次如雷的掌聲，事後却受到許多「自由主義者」的攻擊。

總之，美國社會與西方國家，最大的長處是能容納不同的意見，因此目前索忍尼辛的主張，雖未必受到美國政府的重視，但是張忠棟教授認為，真理是越辯越明的，因此索忍尼辛的高瞻遠矚的見解，終究會受到世人瞭解和實行。（原載六十七年六月廿八日中央日報）

一個中國人

錢穆

讀索忍尼辛哈佛講詞

索忍尼辛不愧是現代世界上位傑出的人物，他飽受着蘇維埃共產極權政治的迫害與磨折，幸而他終於逃出了魔掌，又幸得安居美國，深受美國社會一般的重視。最近又榮獲美國哈佛大學贈予博士學位，他有一篇講演，極受世界人士的重視。我亦因此又連帶讀到兩年前英國電視評論家對他的一篇訪問記。最先，他因愛國心切，刻意盼獲西方力量之援助。但旅居漸久，對西方社會觀察日益深密，遂一轉詞鋒，在人類文化的基本問題上，專對當前美國社會的病痛所在，痛加指責。他的話，也可說是字字珠璣，語語血淚，從大處着眼，從小處舉例，美國人縱不能一時心服，却無法具體答辯。但平心論之，美國人亦自有他一套淵源西歐文化的深厚根基。他移民四百年，到今天，社會富足，生活充殷，既富且強，高踞全世界各國之首。當然有他們的長處。絕不會聽了索忍尼辛一番話，而承認自己一切錯誤，幡然改向。縱使如此，亦非咄嗟可辦。而且輕易失去了自信，遺棄了傳統，亦正足證明其如索忍尼辛所言道德勇氣的淪喪了。

從東西文化特質探討索氏演說重點

不久，美國時代週刊登載了美國知識界八位知名人物對索忍尼辛講詞的評論，有贊同有反對，在贊同的中間仍不免有反對，而在反對的中間亦仍不免有贊同。只從這一點看，美國人還不失為有一種泱泱大國之風，能容人異見，而再加思考。這一點也正可說是美國人之長處。

英國文化史學者湯恩比，亦多對西方文化有批評。他提出宗教復興為最後的救藥。索忍尼辛亦有此見解。在美國時代週刊所發表的某一人之言論中，雖贊同索忍尼辛的指責，而對復興宗教一節則表示反對。這一層說明美國文化雖淵源英倫，而亦有其自己的新趨向。此亦正是美國人意態開朗之可愛處。

且在索忍尼辛的講詞中，論到今天世界分裂的一大段話，遠在一九一七年，當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威爾遜總統曾說：我們必須為弱小民族的權利與自由，為一個全世界的正義領域而戰。在一九一八年威爾遜對美國國會講詞，又提出對大小國家同樣給予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的共同保障，以及充分照顧到民族自決的原則等。此皆犖犖大綱，要言不煩，即今天索忍尼辛所謂分裂的時局，實際依然在向此路邁進。惜乎在巴黎和會中，威爾遜的意見並未為英法政要所接受。而美國民眾亦未對威爾遜的意見有深切瞭解。威爾遜資志已歿。直到今天，美國人亦從未對威爾遜總統那時的一番話，來重新提出，加以闡宣宏揚。然而威爾遜總統還是一個美國人，將來的美國人還可引以自豪。

根據以上諸點，我對西方文化，主要如美國，向未一筆抹煞，如索忍尼辛般，只見其病痛，不見出生存的一番深源潛力。再進一步說，索氏是一俄國人，真照我們東方人的看法，俄國是西方文化傳統中的一部份，只其進步較緩。到今天西方人逐漸轉變論調，像英國的湯恩比，他論世界人類文化，把蘇維

埃劃歸東方。卽如索忍尼辛，也把蘇維埃列入東方，來與西方文化分別立論。其實他們兩人只是在西方文化中分東西。我們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眞從世界人類文化幾千年發展的大系統看來，蘇維埃以及從前的俄羅斯，是萬不該把他劃入東方的。

索忍尼辛亦曾提到東方，他說：任何根深蒂固而獨立自主的古老文化，如中國、印度、回教世界及非洲，從西方的觀點來看，這些世界充滿了玄秘和神奇的事物。又說：俄羅斯有一千年的時間，也屬於此類獨立自主的世界，同爲西方所不瞭解。他在對英國廣播公司的訪問記中又說：由於歷史的機緣，俄羅斯已走過了西方目前所走的路，比西方早了七八十年。索忍尼辛究竟是一文學家，不能算是一人類文化史學者。如上引之點，其中與我們中國人看法應可有甚大歧見。這一層牽涉到世界歷史文化的專門性的學術探討方面去了，我在今天不想從此方面來作更深入的討論。

從我們親身傷痛體驗索氏對西方的指責

但今天我所要提出的，似乎索氏批評西方文化當前病痛的種種話，却可使我們當前的中國人聽了，眞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值得我們來作一番深切的反省。讓我從近代兩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人所親身受到西方文化所給我們的傷痛，人人皆知，人人能記憶的，舉出一兩點來講。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本來也是英法一邊的戰友。但是在凡爾賽和議中，他們却強將德意志在中國佔領青島的不合法的權益，拿來割讓於日本。甚至要擴大範圍到山東的全省。這一種不仁不義不道德的國際大決定，引起了中國的所謂五四運動，從北京大學發起，全國響應，人心沸騰。然而日本人在侵略中國的道路中，却是西方人幫他再開了一條更新更廣的門路。從此就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的中日戰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結束的時候，英美同蘇維埃定了一個雅爾達協定，他們又把中國外蒙古、東三省乃至於向南到了朝鮮半島的北部，將日本人處心積慮強烈佔有的無仁義無道德的不法權益，要拿來轉讓給蘇維埃。這又是一番絕無人道的舉動，而中國人終於屈服在英美意見之下，也承認了這一個協定。毛澤東從他的延安老巢中逃出，他終於憑藉了這一個協定，能在東三省取得了很多的日本軍械，重整他的武力，跑入關內佔領了中國的全大陸。這不能不說雅爾達協定有它重大的關係，重大的影響。

所謂西方自由世界第一個正式承認中共的，就是英國。而美國人則主張國民政府與中共言和，並無其他對國民政府的幫助。而他遠在共產勢力南下之前，早已全部撤離了南京。到後來他們也未嘗不想承認中共，而爲中共所拒絕。他們還只說，要看塵埃落定，對於播遷來臺的國民政府並無絲毫的幫助。直要等毛澤東「抗美援朝」大軍進入朝鮮半島，才始有第七艦隊的東來。到那時，在美國人的心中，才始有一個「流亡」臺灣的國民政府之存在。然而美國的軍隊始終沒有敢在鴨綠江乃至鴨綠江北岸投一枚炸彈，其他更不必說了。

韓國的戰事不論了，越南的戰事也不論了。然而美國總統尼克森親自到大陸，有所謂「上海公報」，有所謂「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呼聲。直到今天，美國還是尋着這一條路在向前。今天美國全國的輿論

最多只是要求在「關係正常化」之下，繼續承認國民政府，保存中美協防條約作爲一個附件，如此而已。索忍尼辛講詞中，指出美國對強大弱小敵友之間種種意態相異，舉措不同。可謂絲絲入扣，語語中肯。而中國人所親受的，則尙恐非索氏意思所及。此乃西方文化傳統，遠自康德以來，只論國際法，並不及國際道德。他們的國際關係，專以各自的利害打算爲主，本無道德勇氣可言，更無論於淪喪。今天西歐列強如英法德義，絕無一國與中華民國有外交關係，他們一體承認中共。而我國人始終自認爲是自由世界之一員。此固亦是中國人之傳統美德，不念舊惡，與人爲善，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謙自抑，虛心求益之思想大道。然而我們聽了索氏之話，實在亦應該有所憬悟。

從一個文化傳統認索氏持平之論

我們可以綜合的來講，蘇維埃政府成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但他勢力推展到東歐，使波蘭匈牙利一切國家都歸入到蘇維埃的權力之下，這是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戰時。今天美國人公開宣言，要和好相處的對象，首先是蘇維埃，其次才輪到與中共的所謂「正常化」。我們從此過程看來，蘇維埃的共產極權是西方英美不斷加以扶助的。而國民政府遷臺，與中共政權的出現，也是受到西方的影響。

所以索氏所指責美國的話，在美國人有他們的歷史傳統，有他們的民族立場，他們不可能一口氣承認索氏的話，而且實際上，平心而論，也並不盡如索氏所指責。然而在我們東方，尤其是中國人來講，索氏所批評指責美國人的話，指責西方文化的話，却是我們所應該深深的體驗深深的反省，有我們的一番覺悟。索氏這番講演中，尚有多話可作我們的暮鼓晨鐘。如他說：西方人持有盲目的優越感。又說：西方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成爲領導這個世界的典型等，都有合於美國威爾遜總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所提出的多項意見。這不是我們中國人亦應同樣看重的嗎？

索氏又說到人類生活並不能拿高級的物質享受爲一終極目標。又說：社會在機械化的法律制度下，也非善策，又及所謂近代西方民主自由生活之日趨輕率及膚淺等語。原講詞長不具引，但本文具在，我國人皆應逐字細嚼，逐語反省，奉爲座右之銘。

又索忍尼辛講詞中，雖極反對蘇維埃的共產主義，但並不會反對俄國人的文化傳統，認爲俄國有他俄國人的一套。這一點更值得我們中國人深切的警惕。我們很少有人能像索忍尼辛那樣強烈地看重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和它的精神內力與道德的意向。他在訪問記中又曾說：一個不能記憶的民族就沒有歷史和靈魂。我們今天的中國人却似乎像索氏所批評的，僅把美國作爲我們的楷模，早已忘掉了我們的以往。單憑這些年臺灣的經濟繁榮，物質享受，認爲就足以反對大陸的共產主義。這距索氏的意見不免又相去太遠了。（六月三十日寫於外雙溪之素書樓）（原載六十七年七月一日中央日報）

784.88
4017
5066

3681441

C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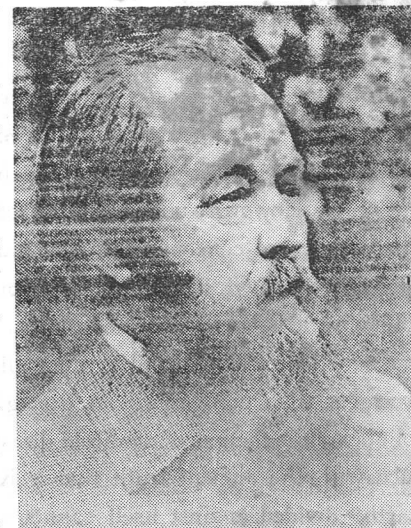
單位：總圖書館 CP

來源：周駿富教授贈

日期：2015.05.21

附錄：『索忍尼辛哈佛講詞』原文
Solzhenitsyn Sees Loss of Courage,
Spiritual Values in Western World

Address delivered by Aleksandr Solzhenitsyn, recipient of an honorary Doctor of Letters degree during the morning exercises, before the Afternoon Commencement Exercises in the Tercentenary Theater. (C) 1978 Aleksandr Solzhenitsyn.



I am sincerely happy to be here with you on this occasion and to become personally acquainted with this old and most prestigious University. My congratulations and very best wishes to all of today's graduates.

Harvard's motto is Veritas. Many of you have already found out and others will find out in the course of their lives that truth eludes us if we do not concentrate with total attention on its pursuit. And even while it eludes us, the illusion still lingers of knowing it and leads to many misunderstandings. Also, truth seldom is pleasant; it is almost invariably bitter.